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0年02、03月合刊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
- 6、更多即时信息，可见：<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成庆

观察员：文学：朱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夏佑至（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

翻译：陈丹丹（英国）、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编者按：

青年时期的托马斯·曼爱好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瓦格纳的音乐，总喜欢以“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那个正在迅速现代化的德国，认为现代社会弃绝了意义，掏空了存在，实在不是什么光明的发展方向。于是在一战爆发后，他写下名篇《一个不问政治者的观察》，认为德国人的精神本质在于文化，精神生活乃是最后旨归，而英美文明不过是机械理性的典型代表。不过就在纳粹上台前夕，他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个他念兹在兹的“德国精神”，被纳粹转换成“怪癖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能见到的粗鲁”，之后的他，开始流亡。

今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喜欢讲“中国站起来”，爱谈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超克”。不过，我们首先或许要作的，是去清理自己的精神，否则，这样的“站起来”难保不会重蹈德国那“粗鲁化的覆辙”。

勘误：

1. 上期“理想主义的Ecstasy：盛世的宏大叙事和创伤后遗症”一文图片说明：“市民在得知google将要撤离的消息后主动前往中关村google 总部鲜花”中的“鲜花”应为“献花”。——读者Evan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 白 朱航满
思想：成 庆
文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 飞：这是谁的城市？——我城这三十五年
孙骁骥：英国新闻业的危机

书评

孙传钊：疑惑中的随手翻翻
张秦峰：鸡皮疙瘩、崇高与政治不适症
裴自余：盛世之下的我们，温吞吞

随笔

王晓渔：“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影像

灵 子：海豚湾：“偏颇”及其意义

行者

扬 克：回忆中的梅斯基尔希游记
言 一：天堂与荒漠

逝者

王晓渔：“你熟睡如橘”——悼张枣

译介

Sally Satel：生物伦理学的局限——专业尽于此，政治始于此
André Glucksmann：天鹅绒哲学革命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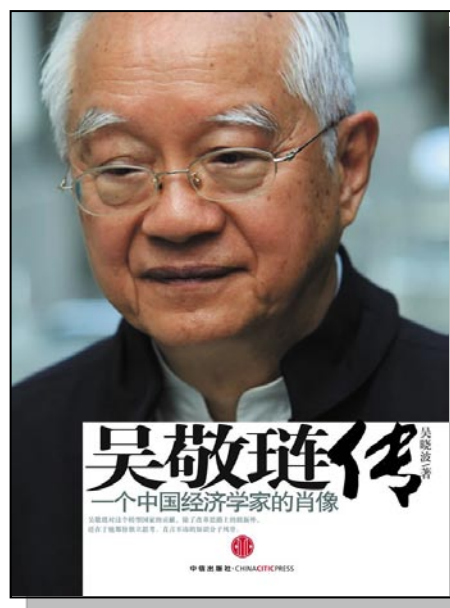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 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圈子, 闹得最火热的一件事情, 是财经作家吴晓波写的新书《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 2010年2月) 被人批评。吴老当年的助理柳红女士在《经济观察报》撰文, 对吴晓波的作品逐条逐句甚至是逐字地挑毛病, 一大堆问题白纸黑字写在新闻纸上, 据说经济学圈子一片哗然。

我不属于任何圈子, 所以刚开始我看这件事相对就比较简单。一方面, 我觉得柳红女士的批评有道理, 这些年我们都有这样的毛病, 就是写作速度太快, 材料来源不严谨, 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好事; 但另一方面, 我也认为, 对于商业化的写作, 学界不必求全责备, 我是支持吴晓波拓展商业写作领域的, 多年来中国的所谓读书人以为在象牙塔里固守清高就可以出成果, 结果是成果全无, 而读书人最后的一点财务自由和精神自由随之也被瓦解, 在这样的向度上, 吴晓波靠写作赢得市场, 赢得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 就值得鼓励。如此, 我认为柳红与吴晓波不应该彼此刻薄, 大家各取所长, 兼听则明, 岂不更好?

不过, 后来的局面显然见证了我的幼稚与我的不在场。因为最近我才发现, 那些靠经济学在中国混饭吃的诸多经济学家们, 已经把讨论的战火烧到了吴敬琏老先生的身上,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是吴敬琏借 80 岁生日, 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打压其他经济学家的地位。这个时候, 吴晓波的写法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其他老资历的经济学家, 以及他们的门生们终于借这本书的错误, 开始堂堂正正攻击吴敬琏了。



这一刻我真的恍然大悟啊。多年以来我都不认为中国会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 但现在各路经济学家都出来了, 而且我才发现, 原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是有派别的, 他们彼此不买账, 彼此看不上, 所谓的文人相轻, 在经济学圈子里, 简直就是地位和金钱的较量。比如现在我就知道了薛暮桥的经济学派别, 于光远的经济学派别, 马国光的经济学派别, 董辅弼的经济学派别, 厉以宁的经济学派别。划分这些派别的人, 他们的意思其实是想告诉我, 在这么多老一代经济学家里, 吴敬琏的价值的确一般, 犯不着给自己树碑立传。

看来, 各路经济学食客们的意图昭然若揭, 他们就是要贬损吴敬琏的价值。这样的格局, 我相信不仅吴晓波没有想到, 批评吴晓波的柳红没有想到, 连吴敬琏先生本人也没有想到。哪里有人群, 哪里就是江湖, 中国的经济学江湖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水平相对较低, 但我想不到的, 就是这么一个低水平的江湖, 竟然是如此凶险的利益格斗场。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年我一直是很感激吴敬琏先生的, 虽然我和他没有交情, 但先生晚年的经济学走向, 却一直深深在带领我思考。我当然知道, 像吴老这个年纪的人, 主要的学习时代和生活时代, 都在 1949 年之后, 一个荒谬的时代, 当然会给他带来更加具体的荒谬感。比如大家都认为他对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坚守, 这些年一直是老而弥坚, 即使当下政府越做越大, 腐败愈演愈烈, 吴老也不改其志。而我感兴趣的却是, 1950 年代, 年轻的吴敬琏却是一个名声鹊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阐释家, 一名主动丢掉经济学丰富的风景, 只愿意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经济语录里辛苦背书的年轻学人。

今天的吴敬琏老人, 当然是一个勇于忏悔的学者。他不回避当年年轻的错误, 事实上他拿出自己的错误给众人看, 是希望人们牢记教训。1957 年, 当毛泽东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 发动全国人民大炼钢铁, 吴敬琏是激动的。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国家经委组织的大炼钢铁考察团, 在四川涪陵, 他看到人们建起了几百个炉子, 火光映红了天空, 他说, “开始的时候, 对这种精神是非常佩服的”。而在 1960 年开春, 吴敬琏参加理论界学习毛泽东《政治经济与读书笔记》的研讨班, 他“完全被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所吸引”, 认为经济研究工作的意义, 就在于阐释毛泽东的这些经济学思想。

可以这么说,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 他的经济学起步, 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名望,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60 年到 1964 年, 吴敬琏写出了他 40 岁之前最重要的论文, 《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他的结论相当清晰, “我国经济结构中私

有制的参与，需要有步骤地加以消除。”而他的论述，看上去相当具有理论的深度。他试图在经典理论的叙述框架中消解所有的思想冲突和争论，他提出的“过渡理论”，甚至为毛和他的计划经济团队提供了灵活的理论工具。

不过，晚年的吴敬琏却说，那篇文章“不过是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的革命逻辑的学术性阐释”。



更加让人费解的事实是，斯文、谦和的吴敬琏不仅在理论上迎合毛的思考，他甚至加入到了对老师孙冶方的批斗之中。日后，吴敬琏直面这样的历史事实，并为此痛心疾首，“当时我和陈吉元都是积极分子，从揭发顾准、骆耕野、杨坚白的所谓历史问题入手，然后就给孙冶方加上了招降纳叛的罪名，开始揭发批斗”。

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成为中国读书人最需要思考的历史图景。为什么聪明如吴敬琏在年轻的时候会彻底丢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还有更了不起的学者如顾准在当时当地也滑进左倾的激进情绪里，对私有产权大加鞭笞，对国有计划体制大唱赞歌。可以肯定地说，那一代人几乎集体跌入了计划经济的狂热中，几乎集体性陷入了对权力偶像的膜拜中。我们不能说年轻的吴敬琏短视、更不能说他盲从，吴晓波的新书《吴敬琏传》陈列了那个时代的荒谬，也再三叙述了吴敬琏的忏悔，但却没有指出内在的原因。当整整一代学人集体沦陷，对别人的指责，对吴敬琏一个人的理解与原谅，或者说吴敬琏自己一个人的忏悔，就显得没有整体意义。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前几日，我向钱颖一教授请教这样的问题，他沿着历史的维度解释了那个时代集体性的癫狂。钱教授提醒我关注 1929 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当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 30 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失业率超过 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而美国总统胡佛的政府刺激政策，以及后来罗斯福的新政，更是强化了政府计划表面的合理性。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却在 1928 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1928 年-1937 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人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1929 年，苏联人大规模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化，其增长速度是过去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的人相信苏联人找到了真理，人们以为一个乌有的美好社会即将出现，连英国人罗素、法国人罗曼·罗兰、中国人胡适之也曾经短时期内认同这样的局面。但是争论还存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以阿斯卡·兰格（Oskar Lange）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学派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论战。争论的焦点正是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样的重大问题。

钱颖一教授的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片历史的天空。所谓理论是苍白的，生命之树长青。经济学的理论争辩，从来都需要实践的检验。60 年之后，全世界试图发展经济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只是这样的 60 年，人类社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人的经济图景和国家图景因此化为乌有。

这样的历史脉络，让人思绪万千。我提醒自己，吴敬琏刚好处在这样的历史迷茫中，当市场经济面对多年的大萧条，当整个世界都在拥抱计划经济，当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跟随苏联模式，年轻的吴敬琏，甚至包括不年轻的顾准、孙冶方、薛暮桥，他们都没有看到更加本质的经济学态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哈耶克，事实上哈耶克本人也理解整个时代的迷茫。1945 年，他写下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社会中知识的使用》，坚定地把经济体制如何有效地使用分散在个人手中的信息作为判断好经济与坏经济的重要标准，而恰恰是个人的自由权利成为分散、利用信息的一个必要条件。沿着这样的路径，哈耶克把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意义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正是哈耶克的理论勇气之所在，可惜的是，中国当年

的经济学人几乎全部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路径思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经济语录背书，他们当然看不到哈耶克的经济学世界，他们一叶障目，他们以偏概全，错过了更加周全的经济学风景。可以这样说，日后的吴敬琏之所以重新回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单一的路径依赖，他终于在一个更加开阔的地方，打开了自己的经济学世界。

这正是吴敬琏经济学人生最不可忽略的历史背景。只有在这样的背景里，我们才不会误读吴敬琏，既不过度责备吴敬琏年轻的错误，也不过度高估吴敬琏的经济学理论。如果说他年轻的错误是一种集体性的迷茫，那么他毕生的经济学成果则是在知识的分散没有最大化的局面下展开的，至少在年轻的时候，吴敬琏没有真正通过知识的分散利用为自己找到本质的经济学观点与方法。事实上，吴老自己也多次言说自己的遗憾，他分外推崇、羡慕年轻一代诸如钱颖一、陈志武等经济学家的知识体系。他知道自己经济学建构在什么地方，知道自己力有不逮，可敬的吴敬琏先生，他终于是一个谦虚、敬畏、忏悔、德高望重、坚守真理的老人。

我还想说，如吴敬琏老，他们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学术生活栖惶如此，作为后学，如果我们的理解缺乏历史语境，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的意思是想说，吴敬琏老先生，其实用了晚年全部的精力，来逃脱一段荒谬的历史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人，谁敢指着鼻子说，我没有罪？我敢说，一个都没有，除了那些内心彻底丧失了廉耻感的人。这么说起来，其实吴敬琏老人的晚景代表着一批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敢于反思，敢于忏悔，同时在晚年敢于说真话的现象。

无独有偶，这边最近传递着《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作者是曾彦修，笔名严秀，1919年生人，煌煌91岁的老人了，曾经官拜《南方日报》社长，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不过，老人家晚年写的这本书，却一直不让出版，只好找到一家NGO机构自费印刷，当作内部资料来交流。这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写的是苏联思想专制史略，下册写的是肃反、战争、经济等几个问题，设计得很素雅，每本书还特意盖上了曾老先生的印章，值得收藏。

抄录老先生的一段话给各位：



我以衰败之年，即1985年-2008年夏秋，写成这两本小册子，当然无异于自寻早死。真的，90岁，求什么？但多少年来，对苏联溃败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总有不少人说成它是由于未能坚持斯大林伟大红旗的结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

就早有定论，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此一趋势，似乎日益扩大。那怎么办呢，回到斯大林时代去吗？

多余的介绍我不再赘述了，有兴趣阅读的朋友，可向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免费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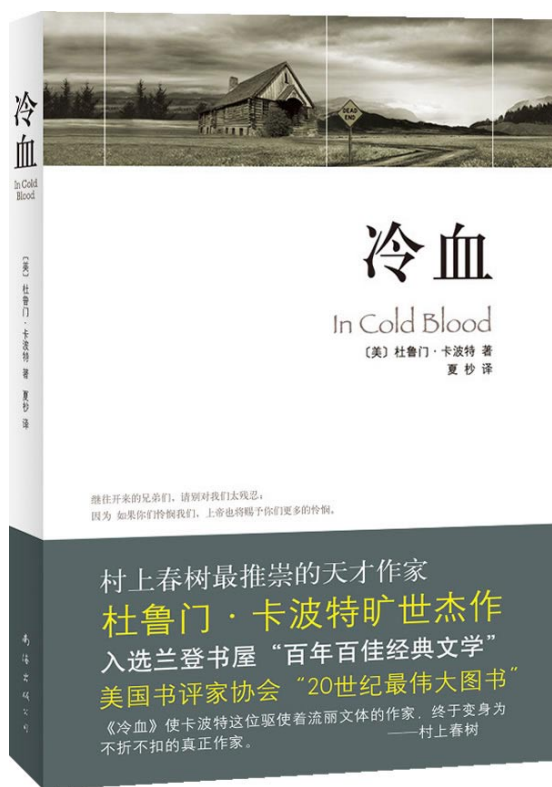
图2为大炼钢铁时期；图3为曾彦修

ESSAY&FICTION 散文与小说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

不能说《冷血》（杜鲁门·卡波特著，夏杪译，南海出版社，2010年1月）这本书对当代中国新闻写作起到过多大影响，但至少几个擅长做深度报道的国内周刊的所谓“迷人的文学写法”，多少都跟这个诞生于半个世纪前的“非虚构小说”有点关系。这里面的“点”哪怕只有“半点”，你也知道起真实影响到底有多重要。“非虚构小说”并非我们所熟知的报告文学，而是一种跟真实新闻事件有关的文学创作，真实性是为了让文学性更加彰显和触动人心。看过《卡波特》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

作家本人是怎样一个喜怒无常的天才，一个非常柔软写过《蒂凡尼的早餐》的人，是如何强悍地写出《冷血》呢？这非常令人耐人寻味，这也是文学魅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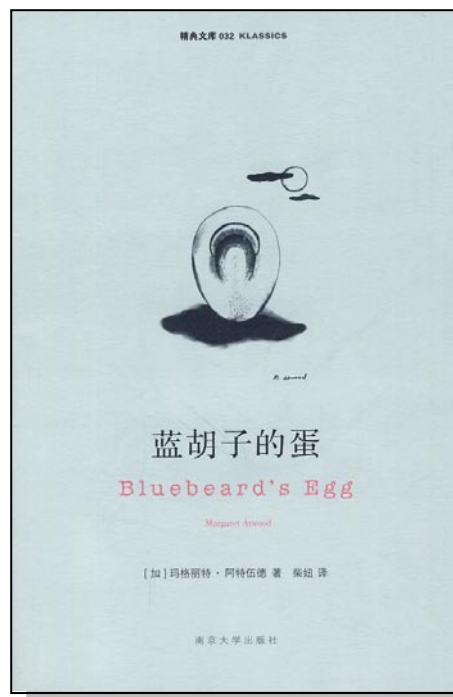
最有创新意识的天才导演库布里克生前最后一部电影的原著，如今出版中文了，《梦幻故事》（施尼茨勒著，林妮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是那种总要颠覆一些东西的作品，我猜想，从它落笔的一开始，就已经注定要带给人类些许毁灭，也许是伦常，也许是惯性，总之要让它的读者大吃一惊。历史上这样的小说不少，比如《洛丽塔》、《麦田守望者》，比较而言，《梦幻故事》的运气差了好多，或许跟它本身的晦涩和过于惊世骇俗有关。

就个人见识来说，我从来没关注过我们的近邻韩国的文学，在很多人眼里韩国是一个跟日本差不多的国家，可是他们在文学或者电影等艺术上，如今的见识度大概也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客地·黄哲暎中短篇小说选》（黄哲暎著，苑英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是我本人第一次关注韩国文学，当然，还没来得及细看，读后感说不出来，但这种朴实的文风很容易让人感受到，现实的故事，极度平淡的叙述，都是黄哲暎给人最初印象。我在翻这本小说集的时候，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学里长时间与世界一流无缘，似乎跟写作题材的受限也有着绝对意义上的关系。一个作家，无法或者不能触碰那些真正惊心动魄的现实题材，其中的憋屈是多么让人难过啊。所以，也不能一味指责我们的作家没劲，各种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看到梁文道在《开卷8分钟》上如痴如醉地介绍毕飞宇的小说，真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平滑而浅薄的文学国度啊，难道一个如此魔幻的

国家就只能产生这种四不象无关痛痒的“局部现实主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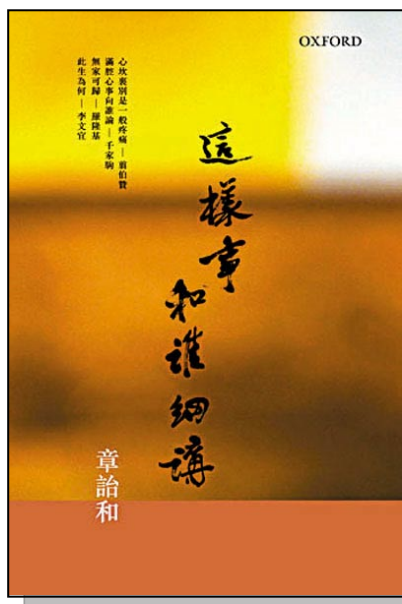
老实说，以前没读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一方面她的书太多了，且又获奖无数，觉得一个人好到那种地步，已经让你读不过来了。这本短篇小说集《蓝胡子的蛋》（柴姐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吸引我读下去的是它的头题小说《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我觉得作者在这篇短小的故事中，表现得够刻薄够变态够没人性。这样说，不是诋毁，而是这种极端的东西如果能自圆其说首先它就是迷人的，“母亲很小的时候，有人给了她一篮子小鸡作为复活节礼物。结果它们全死了……或许，母亲是要通过这个故事，表明她的愚蠢，和多愁善感。”一个女儿对母亲的回忆，还能有多凛冽呢？请看这本小说集吧。

我甚至已经打算放弃介绍卡佛的书了，我说的是这本《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小二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因为书名的这句话如今已经成为庸俗的小资口头禅，作为一种句式已经被各种文青范儿的编辑肆意用作标题。谈不上恶心，但这让人沮丧——凭什么傻得连美国作家四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的人，也在那配谈卡佛啊？张嘴闭口的“当我们……在……什么”，这就是一旦一个东西大众化后在现实中国的轻浮效果。但这本书不用说肯定值得一看，从台湾版就已经让人心动开始，到网上大量网友自译的（本书翻译小二，就是一位资深的卡佛爱好者，一直在网上做着大量的翻译、收集工作），再到正式出版简体字版，可以说它让它的读者已经经历了若干期许般的等候。我觉得卡佛的书已经不需要多介绍了，如果你命中注定是他的读者，只需翻开一页，就会终生追随；如果你注定无缘，那就无需再多看一眼任何介绍了。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126.com)



春节前后,我曾两次到天津,路上带了两本书来读,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似乎感觉有一种奇异的联系。农历新年前,我到天津,路上带的是章诒和女士的旧作《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从石家庄到天津,路上五个多小时,人极多,我只反复读了一篇《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段》,陶醉,感慨,沉思。章诒和女士的几册旧作,我其实已经读过了,但路上实在没书可带,随手带了旧书来读,但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的,经典就是值得反复阅读的东西。从天津归来,重读完了《往事并不如烟》,又找来了章诒和从香港出版的《这样事和谁细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也是断断续续地读完了。章诒和的这册新书只收录了四篇长文,可以看作是《往事并不如烟》的续作,她在序言中这样坦言:

从《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牛津版为《最后的贵族》)到《这样事和谁细讲》,我写的几乎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上层人士。其中有政治家(罗隆基、史良),学者(千家驹),报人(储安平),文人(张伯驹),艺人(马连良)以及交叉党员(李文宜),另外还有卧底(冯亦代)。自叹没有本事,

写不出一部盟史来。这些零星人物荣耀过,耻辱过,高尚过,卑鄙过,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挫折。他们的经历、表现和命运,也许多少能够让人们找到中国民主党派的兴衰轨迹来。写作,在我是很痛苦的,因为它们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字字连着血和肉。

正如章诒和所写得那样,这些的历史和心迹如果没有人记录,或许就只能化作烟云了。作家昆德拉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章诒和所承担的使命,第一要义便在这里。

众所周知,章诒和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章伯钧的女儿,本属于新政权高级干部的后代,但随后章伯钧被列为“头号大右派”,文革中章诒和又因言获罪,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在四川成都被流放和关押数年之久,受尽了屈辱与折磨。天地玄黄,人生逆转。我真不知道该是庆幸还是该深为遗憾,如果不是这样的出身与经历,换作他人,那一段历史怎能够写得这样地细致入微,又高屋建瓴呢?因此,我觉得正因为她的这贴肤的疼痛,才让她有如此大的抗争和如此深的反思,使得她不敢遗忘和抹去那过往的点滴旧事。否则为什么那样多曾遭受苦难的知识分子们,为何一朝翻身,却将往事忘掉的一干二净。章诒和的文字很有魅力,看来是传神入微,读来是抑扬顿挫,这和她内心的情感与个人的气质性情难以分开,而她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与积淀,也是分外的关键与不可忽视的。但我更欣赏她的作品中的高屋建瓴,我以为写这样的东西,不是简单的排泄私愤,而是有着满腔的担当与勇气在其中的,那包含在文字之中的精神与气魂,真是有非同寻常的大关怀才可。这点,章诒和做到了。

章诒和在《这样事和谁细讲》中写罗隆基,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写这位大右派曾在新政权诞生前后,坚决不妥协,坚持为民主党派的独立而作出个人抗议,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有着一一种知识分子的迂腐,但今日看来,他当日的坚持与挣扎确是多么的有价值。也因此,在罗隆基去世之后小型追思会上,坐在角落里的章诒和悄悄的抹眼泪,被几个服务员看见了议论,因此遭到她的破口大骂。我读到此处,真是有几分无奈,但却也感到悲凉,因为这些普通的服务员并不清楚,那一天所追念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应有的价值所在。一个人的价值有多大,其实更应该回到历史的现场中去看,我以为章诒和在此所作的努

力极大，她写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天地变换的年代里所作的个人抗争与努力，尽管失败和微小，但今天看来，其意义并不是那么不值一提，正如她所感慨的那样令人沉思：



民族和个人是一样的，都有自己的生命之途。我们民族很伟大，也很悲哀。从思想意识到政治制度到心理情愫，有一条坚韧的脐带维系着内在连续性。没有一个国家能灭绝它，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改变它。中国只有从内部生发出的力量，才能逐步导致它产生实质性变化，达到洗心革面，焕然一新。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属于这力量的一部分。

去年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卧底》一文，写冯亦代先生在文革中作为“双面人”的角色，读后非常震惊，那种在恐慌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各种个人行为都已经变得可能，为此，章先生讲到千家驹先生的一个小细节，很能写出那个时代的气氛。千家驹的夫人杨音梨本是知识女性，证婚人还是胡适先生。但她几十年来，活得像个主妇。文革中，杨音梨与丈夫一起受尽折磨。千家驹每日归来，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机关没有事吧？”听到一句：“没有事”，才放心地去做晚饭。杨音梨每日拣煤渣，街道邻里也白眼相看。患病的她经常对丈夫说：“真想找个地方让我大哭一场，我的病就会好了。”后来，夫人走了，千家驹恨自己无力保护妻子，恨了一辈子。



读完章先生的文字，意犹未尽，没想到年后又去天津，读的却是一册由袁敏女士所写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在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也是分外感慨。袁敏的这册《重返1976》写的是文革结束前夕，杭州的几位高级干部的子女心怀理想，时常聚会，纵论国事，其中一名外号为“蝓蝓儿”的年轻人制造了当时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的谎言，但没有想到却很快波及全国，酿成一桩震惊全国的政治案件。由此而造成数个家庭遭受莫须有的罪名和牵连，作为事件见证人的袁敏回忆起当年参与这起政治案件的诸多人的命运，曲折连绵，试图带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特别写这起事件给这些当事人后来的命运带来的巨大影响，令人深思。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袁敏现为浙江《江南》杂志的主编，其父母母亲都曾是新政权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曾在江山未定的革命年代立下汗马功劳，对于革命理想有着十分坚定的政治信仰，但在这样一件微小的政治案件中，却完全遭受了令人不敢想象的怀疑和折磨，因此我读此书关于其父亲的章节《老运动员》和关于其

母亲的章节《留守的日子》，最为动人，他们的那种对政治的信仰让人肃然起敬，但也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愚鲁。因为所有的那些风云不过是少数政治投机者为了保全自我利益的策略，而他们却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期待。如果没有 1976 年的文革结束，一切则不可想象，那么此书一定得去重新书写了。

对比章诒和的著作，由此书便有了更多的感想。同样是两册回忆之书，同样是高级干部的后代，同样是女性知识分子，也同样都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境遇，但对比读来，却完全是不同的，前者的历史记忆还未终结，而后者却似乎有一种云开雾散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重返 1976》有一种避重就轻的感觉，作为经受这样历史的一代人应该有更为深层次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庆幸与回忆。《重返 1976》越到最后笔调越为清新，甚至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欣悦，但我觉得恰恰是此书最为失败的地方，一本书不仅仅是面对一个家庭或几个相同命运的人，而是应该关联着更多人的昨天与未来。其实诸如袁敏的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往事，并不稀奇，当年遇罗克因为写作《出身论》而罹难，林昭因为自由思考而被害，杨小凯因为写下《中国向何处去》而陷入深牢大狱，他们的命运更为凄惨，所经受的压力更为巨大，但其起点和最终所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更为深远。我们回忆历史，与自己在历史中所站立的经纬联系紧密。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歇尔在《假人还在行动》（《南方周末》，2010 年 3 月 4 日）一文中回忆他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时曾不断地遭到秘密警察的恐吓、监控、污蔑、跟踪，并制造“假人”档案，以便最终消灭她。许多年以后，在写下这篇文章时，她回首往事，还在继续警告我们，对于历史与记忆，不要那么随便的掉以轻心：“独裁政权灭亡二十年了，这个假人还在闪着荧荧鬼火。还要闪多久？”

图 2 为冯亦代；图 3 为罗隆基；图 4 为章伯钧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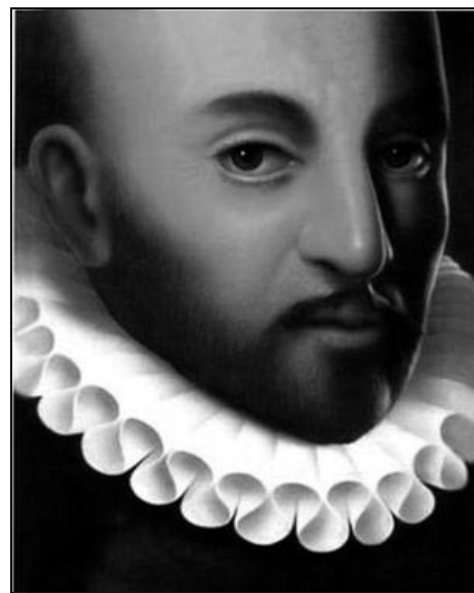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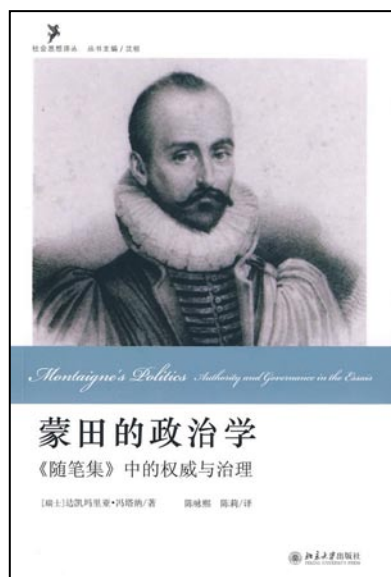
在帕斯卡的眼里，蒙田只不过是个爱慕风雅、津津乐道的小气文人，只要略微翻翻《思想录》，蒙田的名字几乎随处可见，但帕斯卡用来描述他的字眼却很苛刻，例如“混乱，缺乏（正确）的方法”等等，但是假如蒙田真的是一个轻易打发的对手，恐怕帕斯卡就不会在其书中大量引用蒙田了，甚至在《思想录》这部杂糅的残篇集中，许多蒙田的语录甚至被当作帕斯卡的观点被收入进去。

帕斯卡之所以要对蒙田严阵以待，其实最核心的异议处在于“怀疑主义”，他认为蒙田的“多疑”使得他失去一切虔信，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优柔怯懦”。从历史事实上看，蒙田的这种软弱性格也是有迹可循的，在他的歌颂者茨威格的《蒙田》（舒昌善译，三联书店，2008年12月）一书中，记载了蒙田在鼠疫来临之时的“丑态”，他连换衣服都等不及，穿着原先穿好的衣服就仓皇离开波尔多市，更关键的是，当时他还担任着波尔多的市长一职，却就这样擅离职守，任手下官员如何催促，也绝不回去，直至市长一职任期届满，他才返回到他的古堡，继续开始“寻找自我、认识自我”的思想事业。

如果用加缪《鼠疫》中的存在主义标准来判定蒙田，后者实在显得形象“猥琐”，远不如前者“反抗虚无”那样决绝悲壮，这恐怕也是和帕斯卡对蒙田大力挞伐的原因颇有一致，“怀疑”不能导致“虚无”，不能无所承担，因“怀疑”而爱好自由，甚至为了自由试图逃避公共生活，躲在私人空间一隅（这倒有点道家的气质了），到底是一种“世事练达”，还是个人精神“侏儒化”的症候？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就拿美国政治思想史名家荣迪·史珂拉来说，从政治立场上，她属于自由派行列，但是从思想倾向看，她则是一种蒙田式的怀疑论立场，无论是她对乌托邦思想的厌恶，还是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的拒绝，都让她的思想显露出一种“积极不足，消极有余”的怀疑论特征。而最近出版的一本冯塔纳的《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陈咏熙、陈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更是试图重新从政治角度来为蒙田的“怀疑论”辩护，认为蒙田关注的是价值及其实现之间存在的一种难以消除的紧张关系，对于蒙田来说，人类所能成就的秩序，实际上最终是要靠自己的良心去判断和维系，而不是某种业已成事实的自然法秩序或上帝发秩序指导我们前行，而且蒙田的怀疑论并不是任意性的，





就如史珂拉一样，他们都认为一种专断的权威都是自由的敌人，必须点滴争取，但是与各种激进乌托邦论者不同，他们不认为这种努力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甚至质疑这种乌托邦论本身的虚妄。

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自由主义者朱学勤先生看上去与蒙田气质颇为接近，他当年以反卢梭的激进主义闻名学界，直捣当时正统左翼思潮之黄龙，未几，众人发现，朱学勤先生突然消失于公共舆论中，偶见的文章中，观点也似乎越呈保守之态势，与2000年后逐渐活跃的社会运动与舆论维权渐行渐远。但与甘阳等知识分子拥戴国家主义不同，朱学勤仍然不离其个人主义的本色，在其新近所写的《引无数老鼠竞折腰——谈谷歌的撤离》中，他清晰地表达出对“国进民退”的担忧与讥讽，再次让朱学勤的“保守自由主义论调”呈现出某种“激进”的色彩，可见“保守”一词，还要看语境变化，方能描绘出思潮的微妙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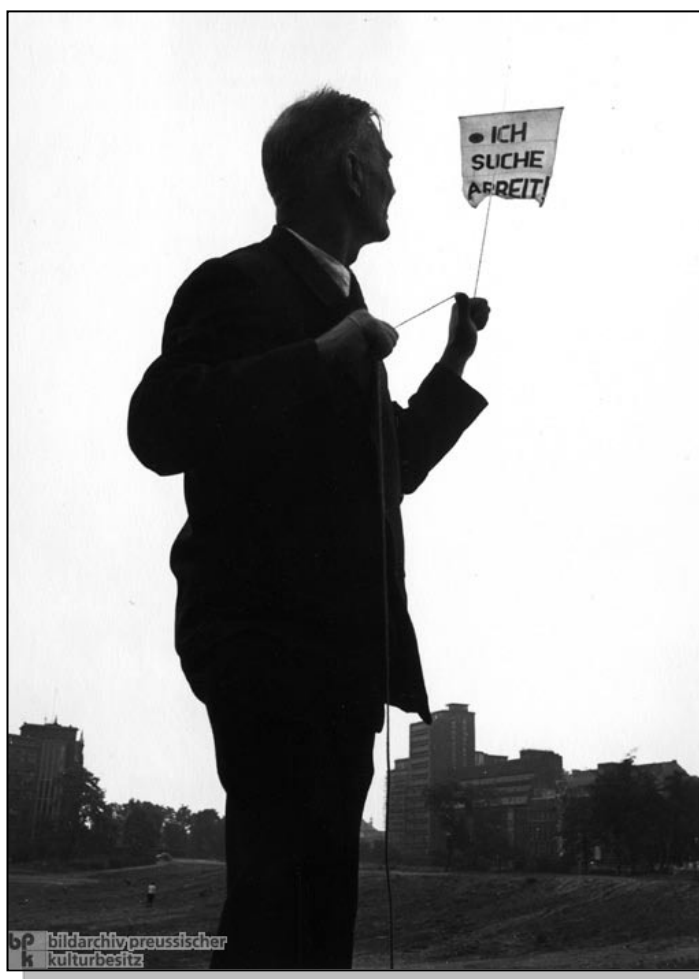
谈到今日国内知识分子群体中兴起的国家主义思潮，让我想起不久前读彼得·盖伊的《魏玛文化》（刘森尧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中看到的一则轶闻，魏玛民国时期有一位青年历史学家克尔（Kehr），此人是著名历史学家梅里克的得意门生，雄心勃勃，当年他的博士论文《海军舰队的建设与政党政治》轰动一时，

其核心要义，就是认为政治的基础在于社会结构与经济利益，他当时写了许多论文，如外交政策、帝国的定位等等，其辛辣程度引得其导师梅里克都警告他：“你这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不过就在这位历史学家如日中天之际，他却突然于1933年去世，此时正是纳粹上台之际，时年三十岁。

克尔未能见证纳粹的执政史，我们也无从知晓他将如何审视第三帝国的兴盛与衰败，毕竟克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还沉浸在《凡尔赛条约》的耻辱情绪当中，天天想着“还我河山”，要重拾旧山河，对于共和政府的软弱充满不屑，在1930年的国会选举中，年轻人开始普遍倾向右翼，纳粹的国会席位从12个一跃到107个，成为魏玛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对于魏玛时期的年轻人而言，那是一个思想饥渴的时代，用盖伊的话说，那是一个充满“诗的力量”、“对完整性的渴望”的年代，甚至连里尔克这种极端珍视个人表达的诗人，也成为一代青年人集体崇拜的精神符号。在这样一种精神活跃，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自由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越来越失去吸引力，按照钱端升的说法，魏玛民国时期的政党极端化是理解纳粹上台的重要指标。不过在我看来，除了钱所认为的“国际形势和经济衰落”的外部原因，魏玛文化的“自由性格”也其实是极端思潮得以盛行的原因，当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难以维系社会后，追求高度个人化的精神表达，最后归流到某种体现德国民族精神的国家主义思潮中，当中的脉络清晰可寻。

第三帝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德国精神从此偃旗息鼓，尼古拉斯·桑巴特在《巴黎的学习岁月》（洪天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中就提到，他在战后来到了巴黎，本是想去感受“存在”的轻松，却不想看到的却是黑格尔的一统天下，其他被法国人重视的思想家还包括海德格尔和尼采。这不禁让人纳闷，法国知识分子为何对德国精神无丝毫反省之意，反而亦步亦趋？如果观察法国在20世纪的思想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德国精神中对存在意义的苦寻，以特殊性的地方文化克服普世文明同质化



的努力，其实成为法国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科耶夫在法国思想界播下的黑格尔精神种子，最终孕育出几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评者，但那位神秘的科耶夫先生，却认为这种“理性的狡计”无法抵抗，他委身政治，谋求建设一个同质化的欧洲共同体。

其实今天看来，德奥文化仍然在不断地拓展其领地，就拿艺术来说，5月和6月来上海演出的数支交响乐团来说，英国爱乐乐团的曲目有贝多芬第四交响乐，BBC交响乐团虽然以德沃夏克压轴，但上半场仍然有莫扎特，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带来的则是布鲁克纳与舒伯特的作品，瑞典广播交响乐团以马勒第一交响乐作为主打。德奥古典音乐的强势今天已成事实，在20世纪60年代，马勒的音乐被重新发现，成为全球古典音乐演出的热门曲目，就连意大利出身的名家指挥阿巴多、夏伊等等，都成为马勒作品的积极诠释者，遑论对欧洲文化跟风的美国交响乐团了。

当然，古典音乐面临的主要敌人无疑是“快餐文化”，欧洲的古典乐由于年轻人的冷漠，在今天已经呈现颓势，美国由于金融危机与经济状况的恶化，乐团的维系也越来越艰难，年轻人也对古典乐了无兴趣。不过现在西方世界突然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来中国演出越来越成为西方乐团的固定项目，就连阿巴多主持的琉森音乐节，去年也移师北京演出，轰动一时。

古典音乐的中国化，其实并不是新近的事物，甚至在文革期间，古典乐也从没缺席过，当然，那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存在，就像《红色狂想曲》(Rhapsody in Red, 2004)一书中所讲的故事那样：1971年10月份基辛格计划二度访华时，周恩来

建议中央交响乐团的指挥李德伦给基辛格演一场贝多芬，当江青询问李德伦他们对哪支曲目最有把握，李德伦回答是贝多芬第五，但是江青的文化顾问于会泳却反对说，第五代表了宿命论，李德伦继续提议，第三交响乐也可以，但是于会泳继续反对，贝多芬第三交响乐鼓吹拿破仑，也不适合。最终于会泳建议第六可以接受，因为这首曲目描写的是大自然。后来李德伦与周恩来在吹风会上讨论时，周恩来评论道，拿破仑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是个雅各宾主义革命者，而且摧毁了封建阶级！

这种扭曲化的确让中国的古典音乐史呈现出某种悖谬的面容，音乐与政治之间的错杂关联难以一言道尽。日前周光蓁的《中央乐团史(1956-1996)》(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12月)就是一部以中央乐团为切入口的音乐(政治史)，我并没有读到此书，但是却看到李德伦的女儿李鹿对此书的批评，认为该书对李德伦的评价有失妥当，甚至成为外媒“向党进攻的工具”。李德伦是否是忠诚的党员我并不知情，卡拉扬为了职业生涯，当年也曾短期秘密加入过纳粹党。但是为李德伦作辩护，并不需拿他的政治角色来作盾牌，相反，一个对党衷心耿耿的艺术家，或许比朝三暮四的艺术家更为可疑，因为他连“艺术自由”的原则都已经放弃，那又何谈艺术呢？据人回忆，李德伦1952年来到苏联学习，当时的他，根本无法理解肖斯

塔科维奇第十交响乐的灰暗沉重，而在1976年多事之秋，他重新聆听肖十，才开始理解了这支曲子。我愿意相信李德伦真正理解了肖斯塔科维奇，但是要理解肖氏，就势必要对苏联与中国革命作一番重新的思索，而我宁愿相信，1976年后的李德伦，已经不是一位“纯粹”的共产党员，否则他的艺术成就，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问号。

图片1为蒙田画像；图片3为1934年汉堡一名失业工人打出标语：“我要一份工作”！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春天未到，却已乱花渐欲迷人眼。钱文忠先生“感动推荐”(腰封原话)、钱理群、梁文道等先生联袂推荐的《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成为一个话题。在这个思想必须成为话题才会被关注的年代，《中国站起来》站起来了，作者摩罗先生这样庄严宣告：“反抗殖民注定是一条血腥之路，崛起未必就不是血腥之路。……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在接受《南都周刊》(2010年3月8日)采访时，站起来的摩罗更是表示：“《我的奋斗》我没看过，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扼制，这是值得敬佩的。”

摩罗的勇气，并不让我吃惊，半个多世纪以来，认为自己站起来的同志都会这样说话。让我略有惊讶的是那些“感动推荐”或者不感动仍然推荐的意见领袖。钱文忠这样说：“我之所以愿意、敢于给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写序，并不是因为我赞成摩罗的所有主张。摩罗不需要世俗的客套和伪饰。对于摩罗新书里的不少见解，我都持有不一样、甚至很不同的看法。只不过，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没有刺破迷雾、击透寂寥的歌哭者。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向摩罗这样的歌哭者致敬，是我无上的荣光。”在《南都周刊》的追问下，钱理群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我参与推荐他的书，除了友谊之外，还因为在当下中国确实面临着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以及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处的问题，讨论本身就有意义。”其二，“我对中国当下的看法、对‘五四’时代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都与摩罗不同。”梁文道道：“刚刚展卷拜读摩罗先生大作《中国站起来》，真是文气浩瀚，佩服。”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钱文忠、钱理群、梁文道等先生似乎完美贯彻了伏尔泰的精神。但是，誓死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不等于誓死赞美对方。按照这几位先生的逻辑，他们在 1920 年代也应该推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因为身陷囹圄还在思考德国未来的希特勒比“刺破迷雾、击透寂寥的歌哭者”更具有先驱精神，因为在当时德国“确实面临着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以及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处的问题，讨论本身就有意义”，因为《我的奋斗》比《中国站起来》“文气浩瀚”一百倍。多么正确的废话，圆滑，太圆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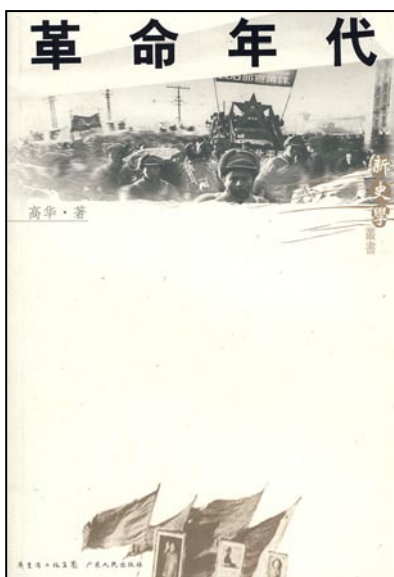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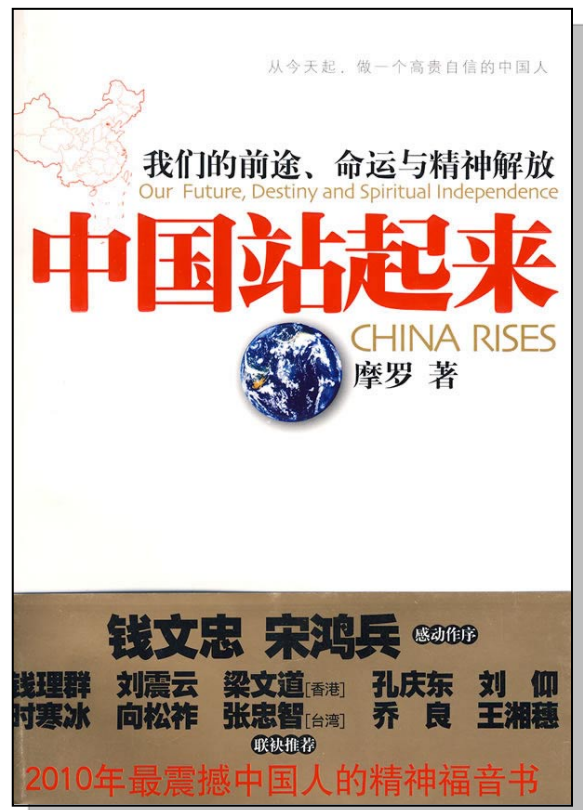
我承认，这样批评有些言重。我与其中一两位有过往来，相见甚欢，也经常拜读他们的文章。正是如此，才会亲者痛。《货币战争》的编写者宋鸿兵推荐《中国可以说》，我不会惊讶，更不会批评。但这几位先生在读者中享有清誉，他们如此舍己为人，有些得不偿失。荐书不是请客吃饭，多元不等于没有底线，这个常识不必多说。我相信，他们在私下场合会更多表达对《中国站起来》的不同观点，但是写作者更需要公开发言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出于同样原因，我没有与这几位先生私下沟通，选择了公开批评的方式，对于他们的雅量，我没有丝毫怀疑。

与其批评一本不值得批评的书，不如赞美一本值得赞美的书。我愿意把敬意送给高华先生和他的《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 月）。大约十余年前，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读到《“肃 AB 团”事件的历史考察》，那个下午我记忆犹新。

关于历史，我们经常有两种“变质论”，一种是“开始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的”，一种是“上面是好的，下面慢慢变坏的”。1930 年的“肃 AB 团”事件，可以证明这两种“变质论”都难以成立。当时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不是文章而是作者，对“肃 AB 团”此前已有了解，但对高华闻所未闻。一个具有如此深厚功力的学者，在大陆名不见经传，那时有些愕然，后来就习以为常了。我相信天命，但是每每想到高华的诸种际遇，总是生发出“天道不仁”的感慨。

《“肃 AB 团”事件的历史考察》未能收入《革命年代》，只是收入《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但是，《革命年代》依然值得阅读。高华没有以 1949 为界把历史一切为二，也没有以国共两党为界把历史一切为二，《革命年代》主要聚焦于 1928 年以后的历史，既包括南京国民政府，也包括长征、延安和共和国。

1928 年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年份，我一直认为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 1911 年或 1949 年，是 20 世纪从民国转型为党国的关键年份。王奇生先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1 月）讲述了党国的“史前史”。这本书的封底自陈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重新检视近代中



国革命，追问革命文化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去熟悉化”有些拗口，借用一个文学术语，可以称作“陌生化”。中国历史，最现实的也是最魔幻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划分，常常以1949年或者国共两党为界。可是，王奇生的研究指出，革命话语的建构，国民党起到筚路蓝缕的作用。革命的前提就是敌我之分，革命话语必然衍生一套关于反革命的言说。1927年，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制定《反革命罪条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反革命”定为刑事罪名，这个罪名在大陆存在了70年之久。

朱学勤先生的成名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法国大革命里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前身。王奇生则指出，20世纪中国两次大革命，一次是1925至1927年，一次是1966至1976年。第二次大革命的革命方式，诸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包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湖南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早已有之。这也再次证明，两种“变质论”难以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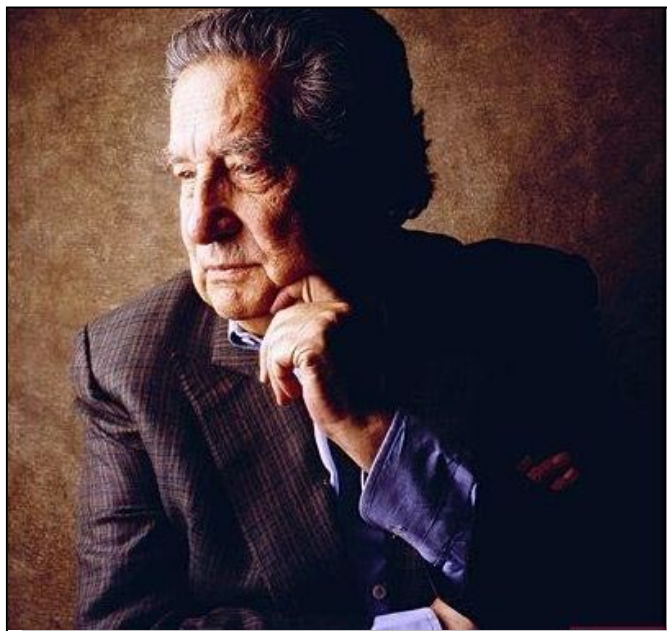
体育总局副局座教育运动员，应该先感谢国家，再感谢父母。在《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里，许倬云先生反复讲到，五十岁之后警觉到不能盲目爱国。他表示：“国家主义是灾害，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他还指出：“最大的全人类和最小的个人，这两项是真实不虚的”。因此，他愿意尊敬每个人，也爱全人类，但是对于国、族、姓保持存疑。许倬云说出了一半，另一半是尤其不能盲目热爱党国，不仅如此，更不能理性热爱党国，这样更加危险。不少学者使用了十八般理论武器，梳理党国精神遗产，或者寻求党国认同，正可谓“君子误国，尤甚小人”。爱国爱得反人类，爱国爱得反人性，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是一次两次，那国多半是党国。

历史常常囿于国家、民族或者党派观念，诗倒是经常具有个人和人类的双重视野。3月8日，张枣先生去世。我翻出他的《春秋来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同时翻出钟鸣先生的《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柏桦先生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我常常想回到自己最初进入的诗评领域，回到“天高皇帝远”的世界，但是转而想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断了这种念头。但是，我愿意保持读诗的习惯，让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地

保持“陌生化”，以免一不留神被革命或者反革命话语绑架。

1976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推出《众树歌唱》，成为此岸部分诗人的秘笈，北岛最初知道帕斯就是通过这本书。在一片严打、清污的肃杀中，众声喧哗尚且可望而不可即，何况“众树歌唱”？对大陆读者来说，叶威廉先生编选、翻译的《众树歌唱：欧美现代诗100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迟到了三十多年。当时的版本收有十二位诗人的作品，除了策兰、博尔赫斯、帕斯今天已为文学读者熟知，赛菲里斯、蒙塔莱、博纳富瓦、马查多还只限于小众范围，其他几位至今还是名不见经传。

唐晓渡、西川两位先生主编的《当代国际诗坛》（作家出版社，2008年至2009年）已经出版三辑，正如卷首语所言，这份丛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还有，《外国诗》。对诗比较熟悉的朋友，看到这种联想，想必会知道《当代国际诗坛》的价值，不



必多说。

图4为帕斯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HONG KONG 香港

这是谁的城市？——我城这三十五年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旧金山，fei.yan@green.oxon.org）

这是谁的城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香港作家西西在其经典作品《我城》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2009年的最后一天，凌晨1点半，我正坐在周恩中的家里，和朱凯迪聊香港这几年涌现出的公民抗争与保育运动。我们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几年，香港人迸发出了一种“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的决心和行动力，而香港一群八十后的年轻人，更是凝聚成运动的主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介入社会议题，并感染着新一波青年人的参与。

周和朱都是香港“本土行动”的核心成员。2006年底，香港政府正式启动了中环第三期填海工程，曾陪伴香港人一个世纪之多的天星码头遭遇清拆。在推土机的巨大咆哮之下，“本土行动”宣告成立，他们通过集会、辩论、出版刊物等形式，呼吁港府重视对承载香港故事之公共空间的保育，以保存香港人共同的集体记忆。三年后，这座城市里，反高铁的洪流正在汇聚；立法会门外，日夜苦行的青年也在以一种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公义和尊重的诉求。

我一直感到很好奇，以周和朱为代表的这一代香港年轻人，他们投身社会运动的巨大力量和热情从何而来——这里，不是被人们称作“浮城”，不是被贬喻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吗？为什么在他们身上，我似乎又重新看到一个充满了活泼、进取、冲劲、动感和开放的城市，就好像西西《我城》中七十年代的那个香港。

七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城市。在总督麦理浩的社会改革之下，港府先后创立了廉政公署整治官员贪污，设劳工署调解劳资纠纷，同时启动长期建公屋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以及九年制免费基础教育，从而打下了香港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而七十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也及时雨地解决了香港日渐百物腾贵的困局。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相应地带动出向上流动的机会。年轻人无须忧虑出路，只要肯努力，谦虚学习，就可以很快地在个人事业上取得大发展。在这一个充满盼望的年代，《我城》里的阿果努力地修理电话，麦快乐认真地看守公园，尽管这并不是一个童话世界，社会依旧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都觉得不需担心，因为他们深信，只要同舟共济，没有问题是不可解决的。连电视台的新闻评述员都说：“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不必过分担心的。你害怕石油的危机会把我们陷于能源的绝境吗，你看看，我们不是安然度过了吗。你为了水塘的干涸而惊慌恐惧，认为我们即从此要生活如同沙漠了么。你看，及时雨就来了。对于这个世界，你无需感到绝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跟随着《我城》这本小说一起在七十年代中期出生，或者之后几年出生的新一代香港人，却在很多社会观察家的笔下，被定义为困惑、失落、感到绝望的一代。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香港经济起飞的黄金白银期，青年时便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谈判。到了九十年代，伴随着大学及专业资格的普及化，学历一跃成为个人能否晋身中产的关键，埋头苦学待到大学毕业，却发现香港正面临着“边缘化”、“下流化”的“中年危机”和政治迷思。由于经济转型及资源分配的困顿，社会流动日趋僵化甚至停滞，机遇不再信手拈来，过往七十年代个人只要努力拼搏就可以成功的经验亦烟消云散。《我城》里的光采和朝气不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惶惑与不安，同舟共济、包容互谅的香港精神也仿佛成为了书本上的桥段。

但，2006年底的保卫天星码头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个月，保卫码头的年轻人手挽着手，用身体挡在推土机前面，他们虽然不停的被警察阻挠、不停的地被抬走，不停的被驱赶，却唤醒了大众对本土文化的珍视，对回归城市空间的诉求。这之后，愈来愈多香港的年轻人深入到城市的角落里，挖掘城市所赋予的身份意识、本土情怀，以对抗单极的地产业主义和中环价值，有关集体记忆、文化保育、创意艺术、社区重建等议题也因此重新受到重视。

西西在《我城》里曾问，“如果这个炮有一天又轰起来了，你怎样呢？你会逃走吗？你会守住这个城吗？”今日香港，地产集团垄断并主宰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日趋明显的大陆化趋势也戏剧性地把香港“只是另一个大陆城市”的身份彰显出来。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却愈发树立出对这个社会自主承担的立场，重申这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是“我城”。这样的转变，无疑是根植于本土经验的香港年轻一代对于香港价值的失衡、本土空间的萎缩、主体性被长期贬抑所作的反抗。

周恩中的家里就好像一个小型的公共图书室，地上、沙发上、桌椅上都凌乱地堆放着各种书籍，很多都是关于香港本土论述的文论，以及各种理论经典。这批香港青年人的能量，很让我感到吃惊。在“我城”的情怀之下，他们不仅仅是有行动欲望、能力和政治视野的行动者，同时也是书写者，会去读理论，会用不间断的写作来理性地阐述自己的想法，而不像某



种作家采取不涉政治的避世姿态。对照内地同样年纪的年轻人，似乎很难找出与之相应的人物。在社会转型的诸多问题面前，我们也会感到焦虑、迷惘、愤怒，但是我们的苦闷都是很内向的，都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在个体上的宣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情绪上的困境，其实也是集体的困境，是社会结构上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两地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似乎缺乏了对“我城”的体认，或者在消极冷漠的接受既有的规制安排，或者在“我国”的光环之下高唱盛世，而难以形构成一个有力的共同体。城市既然让生活更更好了，大家都在循规蹈矩、各行其是，微微的小小的嗨。

西西的《我城》虽然写的是香港，但今天再看，其实并不囿于对某一个具体的“城”的怀念与希冀，她也借着阿发的班主任老师之口道出了她的企盼：



“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的新世界。”

图 2 为香港青年抗议皇后码头被拆迁时的情景

西西：《我城》，洪范书店，1999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ENGLAND 英格兰

英国新闻业的危机

特约撰稿人 孙晓璞 (北京,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我的英国老师曾送给我一份《观察家报》1791年创刊号的影印版。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份星期日报纸,当年《观察家报》的外观只能用“薄得可怜”来形容。事实上,读者在阅读它时根本体会不到任何“翻阅”报纸的感觉——那几乎是一张双面都印有细密文字的海报罢了。

不过,外观的简陋并丝毫没有影响这份报纸所具有的雄心壮志,在报纸名称的下方,清晰可辨一行文字:“Unbiased by Prejudice—Uninfluenced by Party”,意思是说该报不受各类偏见或者政党的影响,坚持新闻的客观原则。

在这个新闻日益泛滥,媒体信誉不断贬值的时代,端详这样一份拷贝过来的“历史文物”令人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如果说新闻业的发源是来自人们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并将传播这些事实作为其自身的一种责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动辄厚数十版的报纸,是否在这一点上比两百多年前的那张单薄的“海报”做得更好呢?

对此,当我通过最先进的媒体传播工具互联网来阅读卡迪夫大学对英国近20年来新闻媒体的可靠度以及独立性的调查报告的时候,我只能十分遗憾地得出否定的答案。至少在英国这个地方是这样: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业日益加深的商业化节奏,新闻媒体的公信度实际上在不断降低,媒体报道的可靠程度也大不如前。

在这份报告中,研究者调查了1985年以来英国主要报纸的发行量、利润、雇员情况等多项数据,发现在此期间,包括《泰晤士报》、《卫报》、《每日邮报》在内的主要英国报纸,平均的总版面量增长了两倍多,广告量也增长了近三倍,但是新闻的原创性却大不如前。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目前主要英国报刊超过60%的新闻内容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购买英国新闻社(PA)提供的不署名的通稿,另外,尚有20%的新闻内容部分地引用了英国新闻社的内容。卡迪夫大学的研究者失望地发现,读者买得到的报刊中只有大约12%的内容能够被确认为记者第一手的原创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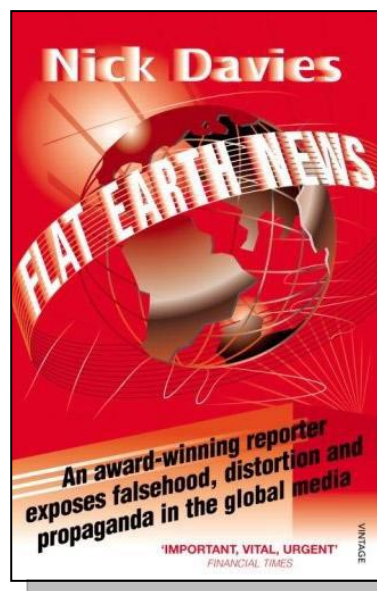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还剩下88%的新闻内容,其来源要么是通过照搬拷贝过来的官方消息,要么是经过改写“硬通货”式的内容而加工,并非记者原创。这也难怪英国不少大学的新闻系,教师向学生强调最多的新闻词汇之一,同时也是学生必修的一堂课——“rewrite”(改写)。原来,这个本领才是英国记者如今用来“防身”的最佳利器。

在报纸日益变厚的今天,真正经过了扎实采访的新闻反而越来越少。这一现实挑战着英国公众对于报纸的信任感,也使人们越发感到,自己手中那叠沉甸甸的印刷物,其实纯正的新闻分量,已经越来越“轻”,越来越背离了新闻的本质意义,甚至变得不像新闻。这个或可被称为“危险”的趋势,也被资深的英国记者和专栏作家尼克·戴维斯所察觉,并把它写进了自己的一本新书里。

在名为《扁平地球新闻》的书中,戴维斯对卡迪夫大学的研究者们的那份报告表示出了赞同,在他看来,正是新闻从业者对于英国新闻社所提供稿件的过分依赖造成了原创新闻的乏善可陈,以及庸俗新闻的泛滥。但是,他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英国新闻社自身。戴维斯认为,新闻商业化所带来的“唯利是图”,使得新闻生产越来越类似于机械化厂房的大规模作业。一方面是报纸版面的不断扩充给记者带来的过重工作负担,另一方面,媒体公司为节省人力成本而削减新闻采编人员的数量,正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英国新闻业积重难返的恶劣现状。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像泰晤士报集团、金融时报集团、快报报业集团等等英国主流的媒体集团,雇员的平均数量大致维持在两千至四千的数量上,其中采编的人员配置在五百至七百人不等,而到了2005年前后,采编人员的总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媒体公司的平均总雇员数量却已经骤减至一千两百人以内。换句话说,在英国的各大报社,员工中记者的构成比率并没有较十几年前更大,但随着报纸版面的扩充,其工作压力却相应变得更繁重了。

重压之下,吃新闻这碗饭的记者,为谋生而计,也只能采取“多抄少写”的策略。毕竟,个人的精力有限,当依靠自身的legwork(实地采访)所撰写的稿件并不足以填满报纸大片大片的空白时,“走捷径”的必要性也就呼之欲出了。作为英国



第二大新闻社的 PA，自然成了记者们最现成的一个“二手报道”来源。

但 PA 的“靠谱”程度有多少？戴维斯对此显然持怀疑态度。在 19 世纪末期建立之初时，英国新闻社便是由当时英国几家大报馆的老板集体出资的，目的是以为英国各地的报社提供更及时、快捷的讯息。至今，它的主要股东还包括每日邮报集团、卫报报业集团、每日电讯集团、DC 汤普森等 27 个媒体巨头。很难说，涉及到诸多后台老板利益的 PA，在其提供新闻的品质上，会不会受到某些“干扰”。

在 PA 每天“生产”出来的数百条新闻中，究竟有多少属于在个人授意以及公关公司干涉之下写出来的公关稿件，又有多少是绝对真实可信、立场无偏倚的纯正新闻？众所周知，公关产业在英国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产业，且不论资产的总值，即便仅从从业者数量上来说，它多年前便已超过了新闻业，并且在内容的控制上，也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新闻报道“应该怎么写”。

据统计，平均一个英国记者的背后，都有至少一名公关人员在影响着他笔下的内容。PA 的 27 个股东之一的联合商业媒介集团公司（UBM）就是著名的公关通讯社的所有者，其业务主顾遍及英国的各大企业、乃至政府机构。其在英国媒体中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 PA 中公关公司的稿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记者，在受到公关公司的电话轰炸和新闻工作压力的双重“折磨”下，当然会向 PA “妥协”。然后呢？拷贝，拷贝，无止尽的拷贝。

这种公关稿件出现的频率，据说已经达到六成以上。尤其是在经济、公司、公共政策领域，在戴维斯看来，这些领域的新闻几乎都可以说是公关稿件。而 PA 作为各大报社新闻的最主要来源，使它成为了包括从英国政府到私人公司在内的重点“公关项目”。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只要搞定了 PA，就意味着搞定了英国的所有媒体。

PA 曾经大致在同一时期发布过两个社会研究报告，一个是说由于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变长，英国人工作的年龄越来越晚，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工作后与父母同住的比率逐年上升；另一个是关于五十至六十岁的英国人在即将退休时选择延期退休的调查，结果显示为了不失去扮演社会中消费者的角色，越来越多即将退休的人都选择继续工作。这个结果经由报刊、电视的不断转载、加工改写之后，已经基本上成为了当代英国人的一个共识。

这两份研究报告的科学依据到底能有多少站得住脚，先存而不论，但 PA 以及复制 PA 新闻的众多英国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将之理解为：这说明英国家庭的结构将发生变化。所有成员都在工作的家庭数量将不断增多，也就意味着全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时间也就变得更长。

不过，很快有人注意到，这两个调查的来源是英国人寿及退休保险的主要供应商，友诚股份有限公司(Friends Provident Pensions Ltd)，PA 的稿件这是受其公关之委托而撰写的。事实上，该保险公司旗下正要推出一份全家人共同投保、共同获利的新型人寿保险服务。但这个有点“打包”性质的保险产品若想大卖，必须在民众造成一种“全家共同体”的概念。于是，这两份研究报告应运而生。

这不禁让人想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英国皇家精神科学院发起“战胜抑郁症”的运动引起 BBC 等媒体对抑郁症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些配上数据、图表、专家意见的报道铺天盖地，让人们很快产生了“抑郁症就在身边”的恐慌心理。其实，这也是公关公司的授意下，英国媒体替药物制造商为价格更高的新一代治疗抑郁症的血清素类药物造势。十多年过去了，新闻的游戏还是同样的玩法。

历史上的著名报人 W.R.赫斯特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新闻不过是某些人不希望刊登的那部分内容，剩下的全是广告。”即使在当初商业化的触手刚刚触及新闻界时，不同商业利益之间的纠葛与妥协，已经占据了新闻总量的可观份额。如今，这种裹着商业外衣的“公共关系学”的泛滥程度，甚至已经到了足以左右报刊观点、导向舆论、一纸遮天的程度。

无可否认的是，在传统的新闻不断被互联网和博客蚕食的时代，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记者，并且，如果他们做得足够好的话，也能具有与过去传统记者大致相同的社会信任度。但同时，当人人都可成为记者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不再具有“专业”记者这一说，传统媒体的所谓客观性，在人们眼中已越来越像一个幼稚的谎言。今天的《观察家报》早已不是当年那张单薄的“海报”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谁能保证今天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会比当年更厚？

“谁更加重要？一个《太阳报》的记者、BBC4 台的记者，还是一个写博客的家庭主妇？”爱德曼公关公司的英国总裁罗伯特·菲利普斯如此问道。在公关公司看来，这三者的公信度可以说毫无差别，唯一称得上“真实”的新闻，就只有受客户委托、经由他们“制造”出来的公关服务。新闻所陷入的“危机”到底是商业化所带来的一个必然趋势，抑或是新闻自身的“堕落”让商业利益的侵蚀更为肆无忌惮？但愿这疑问不至于沦为一个萨特式的吊诡。

Nick Davies, *Flat Earth News: An Award-Winning Reporter Exposes Falsehood, Distortion and Propaganda in the Global Media*, Random House UK, May 2009

BOOKREVIEW 书评

疑惑中的随手翻翻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外国文学专家谢天振在《2009 年翻译文学一瞥》(2009 年 12 期《文景》)一文中专门用了一些篇幅强调: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又一次把殊荣送给了国际文坛上名不见经传的无名鼠辈。这一段评论不算短,但是谢先生说话态度很诚恳,所以我还是要在这一冗长地援引:

.....，然而 2009 年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却不仅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们大跌眼镜，同时也让我从此前的自鸣得意中清醒过来。得奖者赫塔·密勒的名字，别说是我国大多数外国文学研究者，即使是国内的德国文学专家，似乎也对她鲜有所知——国内对她的作品此前只翻译过两篇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至于国内专家编著的德国文学史，即使是最新出版的，也难觅她的踪影。

新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本不足为怪，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类似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奇怪的是有些人居然就据此断言或批评国内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没有事业心”，只会“人云亦云”。（兴安“赫塔·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了什么？”，《文汇读书周报》10月16日）对此我实在难以苟同。不仅如此，我还想说，那些在诺贝尔名单公布后就立即忙不迭地跟着乱说并吹捧得主“走进了世界文学的中心，占据了人类写作的制高点”的人，那才是真正的“人云亦云”呢。

密勒凭什么得奖？从有关背景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凭的是她“对政治的关注”，“对集权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给予的深刻批判”。至于她的文学成就，除了在她得奖后有位出



版家说的“她的文字强有力且充满着理性的光芒”这样的客套话外，我们所听到、所知道的实在不多。我无意贬低密勒的文学

成就，我相信她在这方面一定是有些成就的，这是基于对诺奖评委的信任。但与此同时，我更相信德国的文学研究专家，更相信我们国内的德国文学研究专家。后者尽管不在德国国内，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国文学界的研究者到相应国家进行访问、进行实地研究、与相关国家的文学研究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之多，应该说已经到了几乎没有隔阂的地步。假如密勒真的如某些人所说，在德国已经进入了德国文学（且不说世界文学）的“中心”，已经占据了德语写作（且不说人类写作）的“制高点”，那么她首先一定会引起德国国内的文学研究专家、然后也立刻会引起我国德语文学研究专家、甚至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们的关注，并进入他们的研究、译介视野。因此，我们国内外国文学界对密勒创作关注和研究的缺失，只能说明密勒创作的影响力此前还不足以引起他们（是否还包括德国本土的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当然，密勒及其创作在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那是肯定会引起德国本土的、中国的、以及世界各国的德语文学研究界、甚至广大文学界的关注的。这也正是诺奖评委们的目的：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得奖“意外”的同时，不正是在借此推行他们的某种理念么？这种理念，有文学的，有诗学的，但显然也不乏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有文学的，有诗学的，但显然也不乏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赫塔·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了什么？我想，就说明了这个。

我连诺贝尔文学家的评委们的姓名都不知道，没有读过几部最近几年诺贝尔奖得奖作家的作品，也不像谢先生那样对西方文坛了如指掌，而且是对属于“虚构读物”的文学作品不很关心的读者，当然不能像谢先生那样说出那么多道道来。倒是谢先生的评论提示我去关注一下赫塔·密勒。（其他中国翻译家似乎都叫她“缪勒”）我查了一下网络，从以下英文（非德文）网页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ta_M%C3%BCller 得知 200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缪勒以前获得过这些文学奖：

1981 Adam-Müller-Guttenbrunn Sponsored Prize the Temeswar Literature Circle

1984 Aspekte Literature Prize

1985 Rauris Literature Prize

1985 Encouragement Prize of the Literature Award of Bremen

1987 Ricarda-Huch Prize of Darmstadt

1989 Marieluise-Fleißer Prize of Ingolstadt

1989 German Language Prize, together with Gerhardt Csejka, Helmuth Frauendorfer, Klaus Hensel, Johann Lippert, Werner Söllner, William Totok, Richard Wagner

1990 Roswitha Medal of Knowledge of Bad Gandersheim

1991 Kranichsteiner Literature Prize

1993 Critical Prize for Literature

1994 Kleist Prize

1995 Aristeion Prize

1995/96 City-writer of Frankfurt-Bergen-Enkheim

1997 Literature Prize of Graz

1998 Ida-Dehmel Literature Prize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Literary Award for The Land of Green Plums

2001 Cicero Speaker Prize

2002 Carl-Zuckmayer-Medaille of Rhineland-Palatinate

2003 Joseph-Breitbach Prize (together with Christoph Meckel and Harald Weinrich)

2004 Literature Prize of Konrad-Adenauer-Stiftung

2005 Berlin Literature Prize

2006 Würth Prize for European Literature und Walter-Hasenclever Literature Prize

2009 Franz Werfel Human Rights Award, in particular for her novel Everything I Possess I Carry With Me[24]

2009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0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Prize



读了这段获奖 list,我对谢先生这篇评论的权威性、对谢先生其他学术著述的权威性都产生了怀疑,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事:难道他连查一下英文网页好奇心也没有?倘若年龄大了不会上网,难道不可以让手下的博士、硕士弟子查一下?当然谢先生不肯随着这 list “人云亦云”,不与国际接轨,西方文学研究坚持本土化,保持独立阅读的精神,还是值得敬佩的,在当今中国弥足珍贵。

但是,我难以克制自己的好奇心,带着谢先生给我的疑惑和启示,找来赫塔·缪勒在 2009 年秋天出版的一本名为《克里斯蒂娜与虚构的她:或秘密警察档案的记载》[*Cristina und ihre Attrappe: oder Was(nicht) in des Akten der Securitate stet(Broschiert)*] 的小册子翻翻,在这里说说读后的感想。

如果说缪勒以往的小说都是说出了自己从 1953 年至 1987 年期间在罗马尼亚监视体制下生活的各种恐怖的片断的话,那么这本小册子却是以好不容易搞到手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Securitate)有关自己的档案为线索,用一种难得的归结的手法来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这份代号为“克里斯蒂娜”的秘密警察档案所收录的材料非常庞大、厚实,分三部分长达 914 页,从 1983 年开始一直记录到 1993 年——齐奥塞斯科(Nicolae Ceausescu)政权垮台后的第四年。齐奥塞斯科时代的秘密警察 1989 年后四年内,只是把机构名称改成:“罗马尼亚信息服务部”(Rumänischer Informationsdienst)。其间,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没有销毁这些旧时代的档案,倒是花了很多时间把许多对自己不利部分加以修改、重写,以至于缪勒的档案中,许多重要问题都给扭曲或遗漏了。缪勒在这本小册子中,通过回忆,把档案材料中那些被扭曲、遗漏的要点复原。作为东欧的边缘的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与电影《窃听者》(Das Leben der Anderen)中的东德的同行(Staatssi)相比,更是肆无忌惮。缪勒不堪回首感叹:回罗马尼亚的时候,仿佛有一种现实的时间、空间在向过去瞬间移动的感觉,感觉自己的人生不过是某种偶然而已,却很难寻到自己曾经有过的遭遇。不仅当年缪勒在罗马尼亚加入的追求创作自由的德裔文学团体“巴纳特行动小组”(Aktionsgruppe)不断遭受来自官方中伤、诽谤;根据这份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档案记载,在德国的、反对缪勒所属的读书会那些“运动”的背后,也是得到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全面支持。缪勒对这种“矢志不渝”扼杀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的精神,感到毛骨悚然。

缪勒在书中强调秘密警察对人生最大影响是恐惧。这种恐惧是那种体制下生活过的人意识中终生挥之不去的。同样从罗马尼亚移民德国的文人马内阿(Norman Manea,后来又去了美国)、在自由的写作中也都流露出这种恐惧。所以,在齐奥塞斯科政权垮台后,缪勒的创作题材更加直接描写罗马尼亚往昔庶民日常生活,个人经验和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先创作中使用的隐喻。她在小说《狐狸当时是猎人》(Der Fuchswar damals schon der Jäger, 1992)中,是通过被暗中盯梢、住宅搜索的主人翁——一位女教师回到家里发现秘密警察故意在抽水马桶里留下烟蒂、甚至把房间里铺在地板上的狐皮的四条腿——一切断——制造威胁、恐吓,最后导致女教师精神崩溃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恐惧。

秘密警察不仅有让人感到恐惧,还能让被监视的对方内心因为挫折、孤独而感到绝望。对照档案,缪勒回忆起这样经历:当自己拒绝告密、拒绝提供情报场合,秘密警察就恶毒放出风声说自己是秘密警察的特务,就失去原先想要保护自己的同事

和亲友的信赖，人们就都对被审查对象保持沉默，亲友之间往昔的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而正当个人处于孤立、绝望的境地，会有伸出援助的手的“好友”出现，其实这个“好友”却是警察的一条狗。有曾与一位这样“好友”绝交的缪勒在读了秘密警察的关于自己档案后，“感到侥幸”——自己出国后证实了这位“好友”是告密者，与这位“好友”（已经去世）之间的情感没有成为警察当局的工具。波兰秘密警察也曾使用过这种撒布假情报、把水捣浑，造成人们相互猜疑的手法，秘密警察在与团结工会谈判文件、审讯瓦文萨的记录中做手脚，不时放风暗示瓦文萨是他们的内线，导致瓦文萨要不仅经常要对战友们解释、说明自己的清白，还成为以后新政权内讧的导火线。1992年波兰总理奥尔则斯基(Jan Olszewski)通过内务部公布的1990年前秘密警察的内线名单中有许多反对派的国会议员。该名单包括独立波兰联盟领袖摩邱尔斯基(Leszek Moczulski)和当时的总统、前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档案中被化名代号为：勃兰克），于是，真也假来，假也真，鱼目混珠，引起社会极大骚动和混乱。1993年旧共产党势力在大选中取得胜利后，这个告密者名单才逐渐为人们淡忘，但是依然是一个定时炸弹，说不定在某个时候又会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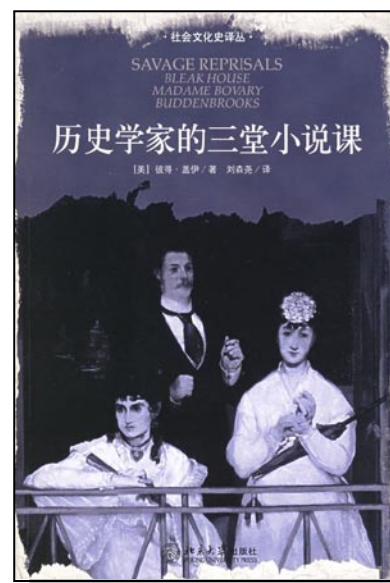
即使在没有移居德国之前创作的作品中也都能见到缪勒人生轨迹隐喻的痕迹。比如短篇小说集《低地》(Niederungen, 1982)反映了农村生活的精神上压抑；《压抑的探戈》(Druckender Tango, 1984)描写家乡农村德裔村民中的法西斯狂热；1986年的小说《人是世上的傻瓜》叙述一个农民为了移民需要护照，遭受当地干部、权势者的欺骗和刁难，不得不可行贿的故事，而写作该小说也正值缪勒自己等待移民许可时期；1989年发表的《只身旅行》(Reisende auf einem Bein)更是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主人翁在西柏林的遭遇，被视外人和不安定身份的感受，与马阿内、托多罗夫相关的文字非常类似。引起德国读者注目的却是1990年代后创作那些建立在个人人生经验和回忆基础上的、更勇敢地直接揭露齐奥塞斯科时代令人窒息社会氛围的小说，上述《狐狸当时是猎人》、《心兽》(Herztier, 1994)、《今天我不愿见自己》(Heute war ich mir Lieber nicht begegnet, 1998)，等等。缪勒知道自己是作家，不是历史学家，明白自己创作的是小说，不是历史学论文；是艺术，不是科学研究。她也知道小说家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将艺术“美”与历史的“真”不矫揉造作地完美地统一起来，所以极力回避那种容易陷入的图解式的白描叙述，写作中注意诗化语言和细节、片断的情景描绘。

缪勒小说隐含着具有普遍性的个人经验、诗化的语言和断片式细腻叙述这三个特色，是她作品在德国获得读者重要原因。1985年起，到获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她不断获得各种文学奖，多达19次。因为德国读者有着双重沉痛记忆敏感点：20世纪中德国人经历过两种极权主义恐怖体制。缪勒获诺贝尔奖后，有些人孤陋寡闻，说缪勒是默默无闻的作家、爆冷门，这种说法与她屡屡获得各种文学奖之事实不符。

海伦娜(Pohland- McCormick Helena)对南非种族主义的研究发现：长期在强势暴力威胁社会环境会危及了国民的身体、心智，人们会丧失按照自我价值观念选择记忆的能力，普遍对历史真实的追忆取保密、谎言和沉默态度，危及个人思考历史的基本能力，这种伤害的后果，这种个体的历史记忆如果与官方历史结合起来，集体记忆就建立在沉默和谎言基础上，对集体的公共的历史构成极大的影响。使其丧失真实性。但是，海伦娜同时也指出，这种沉默、谎言与暴力的共谋不会完全取得成功。因为还有一些建立在个人良知上的记忆，会与集体和官方记忆“交战”。个人的行动可能是不合逻辑和琐碎和软弱的。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单独的讲述和写作不管怎么细小，尽管“个人的细节”(Human detail)通常看起来是不重要的，但是它们与他者相遇，而且也与这个世界互动，个人历史意向的表述会修改、转化甚至重建公共记忆，尽管记忆受到过伤害。(转引自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

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曾在《历史的文本》(Style in History, 1974)一书中谈到艺术之“美”与历史之“真”在文学中的统一问题：

亚里士多德说，诗与史相比更加真实。历史学家布尔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也赞成亚里士多德这一名言。……小说家和诗人也能详尽地表达真理，他们并不是完全不从事社会研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把读者不知道的印刷业的事情接受给读者；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对鲸鱼和捕鲸积累了丰富知识与经



验；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魔山》中虽然不是专门介绍，但是讨论了许多如何治疗肺结核的方法。……与历史研究不同的地方，小说只是更加明显、不为融通事实所限制可以无限驱动想象力去创作。

盖伊认为作家想象力能塑造某个时代中人物及其所处社会的典型，作品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但是，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盖伊又指出：小说或虚构的作品中可能有历史，历史不是小说或虚构的作品。创作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也和历史学家一样，小说中参杂了他们个人的先有的观念，在叙述的时候，这种观念也阻止和约束他们的真实描写和价值判断。托马斯·曼、福楼拜尔和狄更斯都不例外，他们都对中产阶级抱有偏见，对这个阶级持否定态度，把小说作为对中产阶级的复仇，《历史学家三堂小说课》的原书名是 *Savage Reprisals*，直译成中文的话，是“野蛮的报复”。然而，盖伊指出作家的有偏见可能性之本意，并非是单纯指出文学反映历史，不能随意替代历史，倒更想要指出历史学、历史记叙中蕴含的文学性、虚构性。他主要批判目标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的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把语言仅仅作为符号，与活生生的现实完全隔离，完全否认语言外部对言语的左右、控制。文本都被后现代主义者看作是由先前的文本组成的话，那么事实就失去存在的空间。后现代主义者[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海德·怀特(Haideng White)等]的历史观认为事实不是发现的，而是通过语言创作的，事实即言说，历史记述就是故事而已。所以他们认为历史是虚构的，与小说很接近，真实是不可能复原的。

今天，赫塔·缪勒拿出了《克里斯蒂娜与她的虚构或秘密警察档案记载的东西》，反驳有人说她在罗马尼亚期间没有遭受过迫害的谎言，说明了真实与谎言真正的决战，还是要在历史记忆战场上进行。可是，假如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人类没有共同的伦理价值标准——普世的价值标准的话，时常会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干扰，那么，历史学研究要追求真实，也是非常艰辛的。

BOOKREVIEW 书评

鸡皮疙瘩、崇高与政治不适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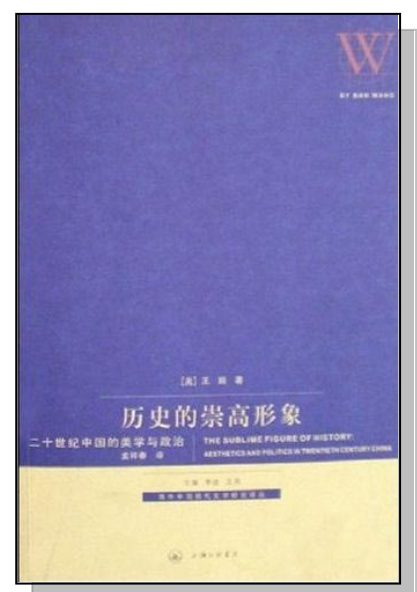
张秦峰（上海，chrin@126.com）

作为观看或是“被”观看主旋律电影的观众来说，我不得不承认，至今在观看这样的电影时，仍然会有一种莫名的体验。特别是在英雄人物英勇就义时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之类的台词时，浑身冷不丁的会激起鸡皮疙瘩。

从生理学上讲，鸡皮疙瘩是人在发生恐惧、害怕等精神情绪变化时，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水平增高，立毛肌收缩，毛发直立的现象。生理学对于鸡皮疙瘩的描述恰巧契合了美学的崇高理论。康德把崇高视作人在遭遇不可估量的空间或强大力量时，人们体验到一种认知无助、无法理解。或者人们会强烈感受到生理无能、无力抗拒压倒性的力量。但在深陷痛苦、难以确定或倍感耻辱中，主体又很快突然被拯救，重新对人类的理性的尊严、坚不可摧的人性的道德力量有了信心。

主旋律电影通过刺激视觉而激起的心理变化进而凸显在体表上的鸡皮疙瘩现象，就是一种崇高体验。恐惧、害怕等情绪直接来自于主体面对客体庞大的空间体积和巨大的力量时的无助，而同时期肾上腺素水平增高和交感神经兴奋则同时是一种被拯救回后的美学体验。

当然，鸡皮疙瘩起因还源自于台词的肉麻，以及作为一个观众深怕周围人洞悉自我内在情感的焦虑。虽然早已有意识的清洗被灌输的“哲学”，但主旋律电影刻画在儿时情感中枢上的烙印却依然难以抹去。这种焦虑非常尴尬，其与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一





书中,回顾自己在观看一部文革期间的电影《春苗》时获得的尴尬相同,那就是——一方面对于电影拙劣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程式化的情节作呕,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在的情绪会被影片夸张的表现所感染,甚至潸然泪下。

对于普通的读者或者观众来说,一部影片或小说能引起观众某种情绪,如感动或激愤或者鸡皮疙瘩,然后在看完后就能立刻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心理中去,这或许是现代人观看电影或文学作品的基本要义所在:进电影院就是为了享受一次情感的渲泄,一次集体式狂喜或悲情。然而,当询问为何自己情绪如此变化,什么东西激起了内在情感反应时,观众就转变为一个研究者。

与国内研究者开篇就关注于民族、国家等当代或历史“大”问题展开的思路不同,个人体验是欧美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博士甚至硕士在进入正式研究阶段前,需要在提交研究计划时附上一份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或动机信(Motivation Letter),其内容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申请者从其个人体验出发而上升到学理上的讨论实则已成为一种常规。研究者自我在历史中或事件中的感触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来说。例如周蕾在《写在家国以外》的序言从其自身“不懂中文”开始着手研究香港在“中国”及“大英帝国”之间的尴尬身份,并最终质问后殖民研究遭遇非西方国家时面对的问题。

王斑从其自我体验开始酝酿“进而研究中国文化中美学与政治的纠结”,其关注的核心就是为何崇高造就了自身的尴尬处境。而革命影片所激起观众产生崇高感以及鸡皮疙瘩,正是通过将个体的情欲转移到政治和革命的叙事中去。它并非是清教徒式的压制个体情感,而是十分乐意通过政治的手腕去宣扬它。情感的利用非但没有削弱而是强化了电影的意识形态力量。伴随着庄严的号角和激昂的乐趣,电影镜头描绘了一个踏上革命生涯的主体在经历了不断的考验和失误,终于上升到历史主体崇高的位置。从《青春之歌》到《聂耳》等一系列主旋律电影无一不采取了相同的崇高化逻辑,他们在观众(也是群众)的潜意识中,在他们感官、情感、欲望以及快感的层面上再造了意识形态。

实际上,从“美学”这门学科诞生的18世纪开始,美学就与政治一直纠结在一起。康德1790年发表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就是试图通过美学来沟通理性与道德的鸿沟,如果说康德的美学最多关注还只是伦理道德上的问题,那么席勒从1793年开始陆续发表的《审美教育书简》直接就以时代的政治问题开始,途经审美,又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终。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艺术,那么美学正是关于诸多对立之间所处平衡状态的一种描述,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正义”也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状态,一种智慧、勇敢和节制三种美德能各安其分而不逾越的平衡。虽然柏拉图要将美和艺术驱逐出他的王国,而席勒却要建立一个“审美王国”,其实两人之间的分歧还不算太远。

席勒煞费苦心地把美学作为政治的救治之道,与中国在20世纪初一开始就把美学作为一剂政治和国族的疗救方案是同一思路。王斑详细的分析了王国维这位看似艺术神圣性、独立性的卫道士,在其著作中却隐藏着一股以美学美育与艺术体验来解决和治疗其时代情绪消沉和道德败坏等弊病的暗流。“王国维所开的良药,就是宗教和美学:下层社会施以宗教,上层阶层化以美学。”(第10页)在战乱纷争的20世纪前半部分,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不遗余力的试图通过美学上的拯救来造就一个新的国民,这与身体上的拯救同步进行(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新星出版社,2006年)。此后,1960年代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而美学作为一门有标准教科书的课程也正是肇始于1960年,王斑注意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其时正逢“三年灾害”时期,在身体遭逢匮乏的时代,中国正是依靠美学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80年代又一次出现了一股“美学热”,其时美学实际上担任起了人文启蒙的角色。

在经历了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渗入一切的泛滥期后,再谈论美学或艺术与政



治的话题似乎没人搭理。这与西方的左派思想（新或后马克思主义）再次被引入中国所遭遇的情形类同。在一个人人避开政治、莫谈国是时代或许是其之幸，因为我们终于从那种干预自我私生活的强权政治中解脱，可以沉浸在自我爱好或审美趣味或对金钱的无止境追逐中；也是时代之不幸，毕竟政治是人得以维系其自由的基本保证，无人过问政治意味着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时代让人去“寻找政治”之时，也是其岌岌可危之时。倘若政治尚不至于危及我，我就避而远之。然而，当真正危及之时，人又显得特别能够容忍，因为时代风气已经如此，我们习惯了在政治上的沉默。因此，伊格尔顿说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 60 年代政治运动退回到书斋里进行自我反省或学术革命。

与美学在理论上总是试图参与政治叙事一样，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通过创作实践着其政治目标。至今，电影作为娱乐与国家政治仍然纠缠不清，每逢国庆或党庆或军庆时，毫无例外的会有主旋律电影奉上献礼。或许是为了躲避主旋律电影的崇高话语，后现代主义通过“恶搞”的反讽式作品，从民族神话到国族英雄，尽其能事地进行崇高的解构。在官方看来，这些恶搞就是一种对其精心所搭构起来的“伟光正”和“高大全”的崇高形象予以搞恶，这一点尤其让其担忧，因为“崇高”叙事的神话会在后现代的“恶搞”洪流里湮没、崩塌。因此，互联网所上传播的恶搞作品遭遇到了严厉的封杀。值得注意的是，禁令并非以互联网的管理部门信息产业部所下达，而是由主管电影与电视审查的广电总局所发布。从其越权的政令中，凸显了作为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的广电总局所具有的政治洞察力。

图 2 为《青春之歌》电影海报；图 3 为《红色娘子军》电影海报

[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

BOOKREVIEW 书评

盛世之下的我们，温吞吞

裴自余（美国·麦迪逊，peiziyu@126.com）

《盛世》为我们描绘的盛世之下的各色人等中，“老陈”这一线索人物耐人寻味。他混迹文化界多年，也算小有名气，终于成为一个人物，重要的是倒手了几处房产，彻底衣食无忧，不过因为生活太安稳、心情太愉快、做人太没压力，换句话说，太有并福感，以至于好几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老陈不算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更像是“成功”的“知识人”，他体验的是一种温吞吞地幸福感。当然还有更多的不那么“成功”的知识人，他们的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交织在一起；在成为文化界的一个人物之前，他们还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他们更多的是温吞吞地不满足。牢骚满腹，却又无能为力。不满现状，也无意激烈地反抗。没有强烈的爱，也没有深刻的恨。更在乎的是房子和股票，性或爱，以及粮食和蔬菜。并不是说这构成了人生的全部追求，只是在得到满足之前，它们比“意义”更有意义。但到了老陈的温吞吞的幸福阶段，意义的困境大概就会凸显，大概而已。

老陈是靠着爱情的力量，才走出此温吞。他喜欢的女人小希，是个“问题人物”，一直麻烦不断，但又始终在追寻与抗争。小说中老陈面临着两条路：第一条路很安静，也富足，但还会有些不满足；第二条路有障碍，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过有爱情。老陈为了追求小希，踏上了第二条路，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小希式的问题：在一个好地狱与一个伪天堂之间，人该如何选择？这是一个关于“真”的问题，但如老陈所言，大多数人对历史真实真相都不在乎、都不会有所坚持，一般人也没法在乎，坚持的代价也太大。但老陈被小希、方草地等拖下水，通过非常手段终于得知真相。小说以“东方既白，两人半遮着自己的眼睛，迎着刺目的晨光，走着”，似乎预示了这些知道了真相的人走出了柏拉图的洞穴，迎向了光明，但他们走向何处？知道了真相之后，生活如何继续？他们将不得不逃亡，而且还不得不保守真相的秘密。那么这“知道”又有什么意义呢？活在虚幻与谎言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好的生活；但仅凭对真相的了解，是否足以让人安身立命，解决意义问题？正如老陈所问的：如果没有信仰，如何坚持下去？

老陈那种温吞吞状态让我很有共鸣。生于 80 年代，没少被灌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念，也曾年少轻狂，怀抱经世之梦想，但一进入大学，随着眼界的打开，高中以前被灌输的意义结构立即土崩瓦解，于是遭遇了人生的第一重危机：由此要么变得现实，随波逐流；要么变得孤僻，愤世嫉俗。不过 90 年代残存的启蒙思潮还是为重塑我们的意义世界打下了

某种底色，处在象牙塔内的我们，或者奉陈寅恪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为主臬，或者借韦伯的“以学术为业”自我安慰。只要徜徉在书斋之中，没有现实的烦恼，就会获得暂时的小幸福。但一遭遇现实，幸福感就随风而逝。最突出的是毕业之际，无异于遭遇另一重危机。所谓的“好”工作要求你不要有什么想法；而不在乎你有没有想法的工作都不怎么好；更甚的是不好的工作都不怎么有。所有理想或者浪漫的念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不堪一击。

过几年，不少同龄人都已经小有所成，有房有车的已经变成了大家艳羡的对象，没有的也正在朝此奋进。尽管你并不以此为目标，但是不比你聪明的人拥有的而你却没有，多少或让你很有挫折感。他们看到的是“奋斗了二十年终于可以一起喝咖啡”的幸福结局，觉得能从一个地方来到上海这种国际大都市，可以驾车一览淮海路的夜景，在新天地觥筹交错，在外滩或者衡山路漫步，重要的是终于在南汇或者松江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已经可以满足，有没有户籍有什么要紧，公不公平有什么关系。你还在批判需要“奋斗二十年”才可以和人家一起喝咖啡，还在奢谈什么自由、民主，这些在他们眼里不过是 loser 的牢骚而已，因为你依然混迹在象牙塔内，还靠着体制内的资源或者在市场中的机会维持温饱，他们已经提前实现了小康。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稳定压倒一切，甚而用自己到世界各地旅行的阅历来说服你，印度破破烂烂不如中国，欧洲的老牌国家也不过如此，城市还没有上海繁荣呢。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占有财富的多少为标准，衡量人生的成败得失，并将成败的理由归根于个人的奋斗，所谓“命苦不能怪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不管以什么方式，赚到钱就是王道。对于那些被损害或被侮辱的，偶尔也抱有同情，但基本视而不见；对于那些贪腐的，基本表示理解，但偶尔也会抱怨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不会刨根问底，追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为什么有些人生而比另外一些人更高贵、更自由，拥有更多权利和机会？当然他们也会承认有腐败，污染等问题，但是他们毫无疑问地认定这就是可能世界里的最好的世界，一边分享着盛世的荣光，一边过着自己安稳的小日子。

尽管你并不承认，但你和他们的差别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大。他们享受着温吞吞的小幸福，你体验着温吞吞的不满足。你尽管对他们不以为然，但你显然也不认为激进的变革会有什么效果；你虽然觉得问题很多，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你不愿意看到暴风雨真的来临，但有时又何尝不希望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理性会把你从烂漫的狂想中拉回，让你重新跌入清醒的温吞状态。与他们的志得意满不同的，是你那无可救药的无能为力。你根本不奢望成为什么国师或策士，但你也不甘于做个



自了汉，可是你对现实没有把握，对未来没有预期，对不确定性充满了恐慌。你会觉得在各种小道消息、八卦、娱乐之外，应该有些严肃的东西；你会关心政治，但又自觉地远离政治；你或许还拥有某种理想，或者至少某种批判现实的判准，但你无从知道如何将这种理想化为现实。理想的归理想，现实的归现实。在书斋内谈理想，在现实里谈风月。某种程度上你过着双面的生活，轻度的精神分裂，成为了盛世之下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这种清醒感与无力感让你很无奈，因为你也没什么信仰。你知道“have

a little faith"的重要,但是你就是无法发自内心的服膺某种宗教,更不用提某家学说了。没有真理在握的亢奋,甚而对有无真理都有某种虚无主义式的怀疑。不会听到那种“天职”的 calling,尽管不愿靠学术混饭吃,但是也不会觉得学术对你的生命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理想早已幻灭,激情逐渐消逝,只是待着时间之手,将陈腐的岁月掩埋。

或许也有爱恋的魔力,指引我们走出温吞?或许也有崇高的召唤,让我们变得有力?或许也有哲学的慰藉,让我们坚持西西弗斯式的反抗?我不知道,但愿能有。

图 1 为陈寅恪,图 2 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图 3 为上海新天地

陈冠中:《盛世:中国,201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ESSAY 随笔

“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部长助理和摄影记者的肢体冲突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按照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的说法:“我们全中国人民都把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访问作为中苏友好的佳节。”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却发生了一起著名的肢体冲突,在中国新闻史上称作“左叶事件”。

晋永权先生在《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里详细讲述了这一跌宕起伏的事件,这本书刚刚出版时我曾经读过,最近又重读了一遍。肢体冲突的一方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另一方是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左叶先生。左叶是军队转业干部,在连环画《宋庄之战》里,八路军像天兵天将一样大显神威,左叶就是这场战斗的指挥者,以至有人称“宋庄之战”和“左叶事件”是左叶一生中的两个重大事件。

关于1957年的肢体冲突,双方有着不同的描述,共同认可的是这么一些情节:4月17日,在刘少奇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首届农业展览会,负责维持秩序的左叶挡住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镜头,摄影记者韩德福抬手拉了一下他,他回头喝问:“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在场记者还提到,左叶曾对摄影记者大声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但是,这句话遭到左叶以及农业部工作人员的否认。据称转述过这句话的一位外交部新闻司干部,事后也否认自己说过此话,并且表示根本不知左叶何许人也,似乎宋庄之战没有那本连环画宣传得那么威名远扬。

这次肢体冲突在新闻界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各路媒体又都保持观望,《文汇报》驻京记者的报道以及相关评论都被压下。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份指示。

5月7日,由胡耀邦分管的《中国青年报》率先破冰,发表该报摄影组组长洪克撰写的《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不点名批评左叶,指出:“近来记者们在采访活动中受到的无理的限制、阻碍是不少的,这几乎已经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种苦恼了。”根据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表批评文章,不必将文章交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因为这种做法害多利少。但是,《部长助理与摄影师》发表之前,报社还是把文章送到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和左叶手



中，请他们就事实部分陈述意见，刘瑞龙不同意发表，在战场上如同天兵天将的左叶感慨：“可惜，我的文化低，要不，我也可以写文章。”同时，报社还将文章送给韩德福和新闻摄影界的目击证人，事件得到他们的证实。

《部长助理与摄影师》最终发表，迅速得到各家媒体的呼应。5月8日，《文汇报》发表《新闻记者的苦恼》，点名批评左叶，同时配发彭子冈撰写的社论《尊重新闻工作者》。彭子冈抗战期间曾与浦熙修、杨刚、戈扬并称后方新闻界“四大名旦”，尖锐批评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在《尊重新闻记者》里，她以自己惯用的笔调指出：“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

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针对左叶的质问，指出：“亲爱的同志，你说错了，在那样的场合，摄影记者的工作，硬是比部长助理的工作重要得多。”袁鹰在《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左叶事件”始末》（《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里透露：“当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迅速在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梁汝怀是袁鹰的笔名。在同一本书里的《笔名勾起的记忆》里，袁鹰回忆40年代后期常用笔名梁汝怀：“因为一位姓梁的好友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不知一路是否安全，常常临风怀想，就在笔名上寄托思念。这个名字我比较喜爱，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还偶尔用它。”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针对部长助理请摄影记者“滚出去”的传言重炮开火：“滚开！对！应该滚开！/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脸，/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股脑儿都滚开，/不许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

朱地在《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华文出版社，2005年）里有一节《“左叶事件”真相》，梳理了当时发生的类似事件：《新民报》记者采访苏联马戏团消息时，被负责招待的同志以横蛮的态度逐出后台；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游览颐和园时，《大公报》记者不断听到有人喊：卡住记者，一个穿西装、系红领带的胖胖的同志说：“记者真讨厌，简直像苍蝇！”——据说他是总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劳动报》记者在采访外宾活动时，被外事处代处长一把拉下来；《新闻日报》记者去旁听第一商业局经理会议，会议开了一半，办公室主任发现记者在场，就把他赶了出来，并说：“你是《新闻日报》的吗？你们怎么知道的？去去去！”《红旗照相馆》提到肢体冲突之后，左叶将这一事件上报到公安部，此外，四川也发生一起“左叶事件”，《西南铁道报》报道机关总务处长高价购买檀香木办公桌，处长提着手枪追赶记者，这位记者只能跑到《人民日报》记者站避难。



在这种情况下，对左叶的批评获得媒体呼应，几乎是一触即发的事情。除了前面提及的《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性媒体都发表了批评文章。虽然也有一位署名张直刚的读者，以“现场目击者”兼“普通读者”的双重身份在《中国青年报》上对摄影记者有所批评，但是这种声音湮没在批评声中。根据《文汇报》驻京记者刘光华的记载，伏罗希洛夫参观首届全国农业展览会时，“事先安排入场的有组织的观众不下5000人，获准进场采访的各新闻媒体记者和摄影人员有60多人”。可见，有现场目击资格的群众经过精心挑选，他们是不是“普通读者”，值得商榷。

熟悉当代政治气候的读者都会知道，1957年5月正是鼓励鸣放的“阳春”，但春天之后不是夏天。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表示：“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这篇文章当时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传阅，直至1977年4月，整整20年后，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次公开发表。

6月8日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同时公开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反应迟钝的《中国青年报》，在这一天还发表了反驳“现场目击者”兼“普通读者”张直刚的文章。随后，整个事件的基调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右派分子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放出一支毒箭。但是，在划定右派时又表现出内外有别的特色。袁鹰回忆：“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根据《红旗照相馆》的记载，袁水拍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并且宣读了书面检讨。但当事人韩德福、洪克等没有划

成右派,《人民日报》摄影组组长高粮是一个例外,他因为坚持自己的目击证言,被划为“漏网右派”,流放至内蒙古,妻子离开,20年未能翻身。重灾区是民主党派报纸《文汇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因为参与报道“左叶事件”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经历20年劳役和流放。为《文汇报》撰写社论《尊重新闻记者》的彭子冈也被打成右派。《文汇报》发表社论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事实极为清楚,制造‘左叶事件’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文汇报》的右派分子是罪魁祸首。”

“左叶事件”本来可以促使各方反思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却因为权力的介入走向反面。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安岗,撰文《“左叶事件”被右派利用说明了什么》(署名郑远)称刘光华极尽煽动之能事。几十年后,高粮获得平反,安岗又撰文盛赞他是“共产主义硬汉子”,“在逆流中仍然坚定而勇敢地拿起照相机”。不知安岗对刘光华和“左叶事件”的评价是否也有改变?

图1为伏罗希洛夫访华情景

FILM 影像

海豚湾:“偏颇”及其意义

灵子 (北京, liufang0815@gmail.com)

纪录片《海豚湾》拿下本届奥斯卡纪录长片大奖之后,引发了内容和操作手法两方面的争议:究竟应不应该捕杀海豚;纪录片能否如此“偏颇”。

片子展现了日本小渔村太地町每年捕杀上万只海豚的行为,几乎每个观众都难以忘怀整个海湾一片血红的残酷场景,继而许下再不去海洋馆看海豚表演的心愿。与此同时,摄制组讲述了他们拍摄过程中付出的种种艰辛,并从物种、经济发展、健康理念、传统文化等角度得出不应捕杀海豚的结论:

海豚是具有高等智慧的哺乳动物,与人类相近,且数量有限;保护海豚并不像日本人声称的那样会威胁鱼类产量和渔业发展;海豚肉含有高毒素,食用对人体有害;日本民族并不像其官员宣称的有食用海豚肉的传统,起码路边随机调查的路人绝大部分不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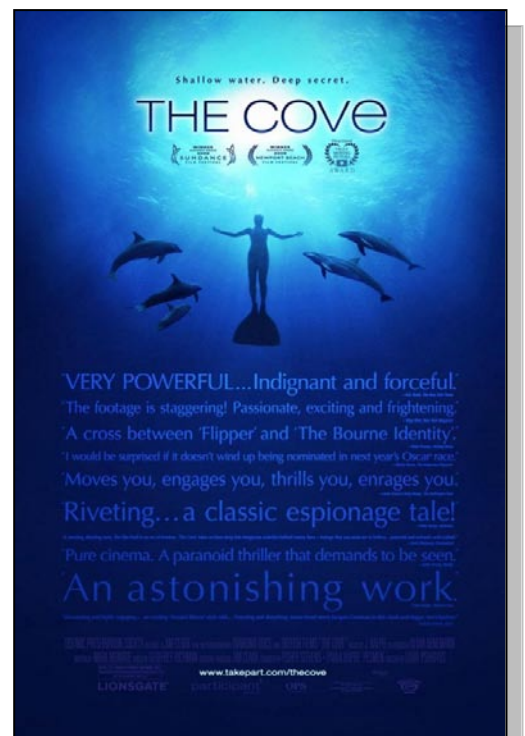
但日本人确实从未放弃这一“嗜好”,起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有了舢板开始。

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禁止以商业为目的的捕鲸之后,日本仍打着“科研”旗号继续捕杀,唯一的改变是,所有的捕鲸船都写上了“RESEARCH”(科研)字样。对于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鲸肉,日方宣称出售所得将作为研究经费。就在今年1月6日,日本捕鲸船“第二昭南丸”号又与国际“海洋守护者协会”的快艇相撞,引起各国环保组织强烈谴责。

科研是否需要屠杀上万数量暂且不说,日本的捕鲸计划也很少产生了什么成果。科研一说立不住脚,倒是其远洋捕鲸业持续增长。目前,日本仅太平洋地区就有捕鲸船1000艘,工人10万,并拥有太地町在内的六个捕鲸基地。

然而,将之解释为纯粹的经济行为,也难以让人信服。片中纪录片主角就尝试以每年支付太地町渔民一定费用的方式来促使其停止捕杀,日本官员仍然只是摇头。

探讨进展到这一步,美国人简直要抓狂了,最终他们不得不奉上一个大概自己也不太相信的答案:“这与经济无关,甚至与政治无关,只不过是所谓大日本帝国的思想余孽在作祟。他们受够了西方国家,受够了他们指挥着做什么,怎么做,何时做。”



该不该捕杀海豚，涉及动物福利、物种平等、环保主义等西方世界一直主张的观念。有观众质疑，如果日本人不应捕杀海豚，那是否韩国人也应该拒绝狗肉，美国人也应该拒绝牛肉？如果海豚仅仅因其智慧和受人喜爱应该得到保护，这对其他物种是否是一种不公平？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是不是要极端到倡导全球素食？

更有甚者，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已经上升的民族主义高度。据说此片获奖后，有日本人抗议美国人侮辱其民族传统，与常见的“西方辱华”论调如出一辙。任何话题一掺杂“传统文化”的标签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并不代表他人因之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有人搬用纪录片应该客观真实再现事情原委的理念，指责摄制组只选取有利于自己的素材。比如影片里多数日本官员、科学家、渔民都是串通一气的愚蠢嘴脸，仿佛从来没有一个人有片刻理性思维。再比如路人的随机采访，谁知道是经过多少失败尝试才有了现在这样最有利于影片主旨的表达？

这些操作其实并无不妥。所谓客观真实，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再怎么搞观点平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都必然是主创意图。大到整个片子的逻辑脉络，小到每一个机位的摆设，哪有一样不带有创作者的预设呢？

无论是纪录片、纪实摄影作品还是新闻报道，以纯粹的客观、旁观、置身事外来作为要求，都未免太苛求了。受众诚然需要通过不同事实侧面得到一个相对接近真实的结论，但这些未必要求在同一部作品中全部呈现。只要整个环境允许各种声音出来，在大的范围内由不同观点构成整体的平衡，就足够了。

从操作技术来讲，《海豚湾》获奖是当之无愧的。它的杰出恰恰在于它的“偏颇”，以大量组织精心、穿插合理的素材形成快节奏的脉络，运用大量蒙太奇技法，而不是像传统纪录片那样为显示其真实，老老实实按照事态发展的顺序“有闻必录”，一个机位摆在那里死不动。这样出来的结果确实是“主观判断”，但持其他论调者也可效仿，也可发声，最终接受哪种观点全在观者个人。

就像此片在日本的发行方宣称的：“我们发行《海豚湾》并不表示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希望把电影放给日本观众看，让他们自己分辨是非。如今争论已经存在，而这部电影的重要性也是确定无疑的，获得奥斯卡更说明了这一点。发行影片为这场争论提供了一个平台。”

《海豚湾》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启示在于，太多创作者们还不懂得怎么讲故事。某些话题即便已经占领道德制高点，即便当事人已经做出更积极有效的参与行动，但创作者们却简单相信仅凭内容本身足够打动人，一任影像以最粗粝的原始形态呈现。事实上，这最后一步看上去属于锦上添花的包装过程才发挥最大的传播作用。

当然，国内还有另一层人人都要拿来作为避难盾牌的制度障碍。很多有力的纪录片创作者出于良知驱动，关注的多是难以进入主流渠道的话题——其实不管你关注贫困、疾病、流浪者还是动物捕杀，但凡略带困境的内容，都难免在深层探讨时踏入敏感地带，导致无法大规模传播。从这种意义上讲，重视讲述手段，抛弃传统观念，更成为必须学习的一课了。

TRAVEL 行者

回忆中的梅斯基尔希游记

特约撰稿人 扬克（德国·图宾根，asukashinjirei@gmail.com）

距离上次游梅斯基尔希（Meßkirch）已经过去一年有余，如今才有闲情将当日的见闻从记忆中检索出来打点一番。

梅斯基尔希是哲人海德格尔的故乡，按照德语文化的民俗划分，属于施瓦本地区。尽管海德格尔是可以列入西方哲学万神殿的人物，但人们始终不忘嘲笑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施瓦本农民。梅斯基尔希虽有市的建制，但视其大小仅算德国巴符州西南部的一个小乡镇。

这里距我就读的图宾根有三个小时的慢速火车加公汽车程。冬日积雪皑皑，同行的三五友人清晨在火车站碰头，踏上出行之路。梅斯基尔希在图宾根大学学期票有效范围内，所以我们不花分文就可以享受德国便捷的列车服务。德国大多数大学的学生均享有这项社会福利待遇。学期票的价格因地而异，从30欧到200欧不等，而德国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0欧上下。德国人将教育视为一项应该最大限度实现公平的公共服务，学生们不仅已经享有良好的教育福利，而且敢于理直气壮提出更多要求，去年的抗议教育改革活动中，以前一直没有学期票的慕尼黑大学生便为自己争取到这项福利，图宾根学生还要

求免费获得另一种交通优惠卡，甚至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竟然要求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教育机构都提供免费午餐。且不说这些要求是否过分，认为政府财政应该最大限度用于提供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的观点至少具有不容忽视和可以商谈的合理性。

火车上乘客稀少，我们这帮人可以在宽敞的座位上肆无忌惮地享受几个小时的闲聊时光。闲谈中自然牵扯到不少海德格爾的轶事。当时刚刚读过海氏学生之一汉斯·约拿斯的回忆录，在书中，从马堡求学时期就跟汉娜·阿伦特有着亲密友谊的约拿斯透露了当年海德格爾向阿伦特示爱的情景。约拿斯在阿伦特生前从未对任何人讲过这件她亲口告诉他的秘密，终于忍不住在回忆录中下了些笔墨描述这件风流韵事。那是1924/25年冬季学期，阿伦特经常在海德格爾的谈话时间拜访他，讨论人生，讨论哲学。当时海德格爾已经是青年学生中的隐秘国王，阿伦特对他十分倾慕。一次谈话时间结束后，阿伦特起身离去，海德格爾陪她走到门口，“突然，他跪了下来，我弯下腰去，他伸出双臂抱住我，我双手捧着他的头，他亲吻我，我也亲吻他。”于是，这位并非风度翩翩的施瓦本农民俘获了一位聪明绝顶的美丽少女、未来举世闻名的政治哲学家的芳心。

不仅如此，他后来的巨著《存在与时间》及其他著作持续吸引着全世界无数青年。我对哲学的兴趣也缘起于梦魔般地阅读《存在与时间》。曾几何时，海德格爾于我而言就象征着世界的根本真理，与他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就意味着触摸到某种神秘的力量，因此去他长期任教的弗莱堡大学求学是我多么梦寐以求之事。然而，真正站到德国的大地上时，以往的魅力已经荡然无存。与人类社会经历了祛魅的现代化类似，人的某种成长也将经历这种祛魅。

临近中午时分，我们在梅斯基尔希的镇中心下车。抬头一望，就是海德格爾的父亲任过司事的教区教堂，一座简单明快的晚期哥特式建筑。海德格爾曾经屡次深情回忆童年时教堂深邃悠远的钟声，并赋予它同样深邃悠远的意义，在他而言，那钟声就是真理对他最早的启示。如今，这座教堂就矗立在我们面前，朴实无华。

小镇里并没有多少值得游览的地方，大家漫不经心地穿行在一条条幽静的小巷里。路过两家墓碑店，倒成了最大看点。其中一家可谓一间雕塑工作室，设计的墓碑别具现代艺术风格，另一家则是个小作坊，作品是毫无雕饰的花岗岩石块，虽形制不规，不似传统墓碑方方正正，也有古旧的浑然朴拙味道。很快，我们在城市公墓看到了现代与传统两种风格的自然交融。



城市公墓位于镇子边缘，海德格爾与他家人的墓地就坐落在那里，在一家花店合买了一束百合后大家步行前往。与国人印象中阴森幽暗的墓地不同，德国的公墓就如同它的德语称呼 *Friedenhof* 的字面意思一般，是最宁静的园地。每到一座德国名城，我都会兴味盎然去树影婆娑的城市公墓散步。而在图宾根，我们甚至会时不时在夜晚穿越埋葬着数位文豪、哲人、党魁和巨贾的公墓前往教堂或者车站。此时，在被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梅斯基尔希的公墓显得格外安详。站在海德格爾墓前，心里竟真是没有任何激动和感触了，我们甚至为了拍照留念将献花仪式上演了两次。

人们往往提及，海德格爾的墓碑上是颗星星而非十字架。与明清以来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中国士人在选择自己的葬礼时面对传统与基督教两种方式的冲突相似，海德格爾这位曾经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和古希腊思想的追随者去世后也陷入了这样一件纷争，最终他的葬礼按照天主教仪式进行，而他的墓碑上留下了一颗明亮的星星。晚近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一再强调，从新教对天主教教仪的反动，再到现代科学主义世界观对传统仪式的颠覆，人们的生活秩序受到极大销蚀。然而，无论遵从哪种信仰下的生活方式，最终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安息之所。放眼



兴的人物，也不见几个学问人品让人真心钦佩的，竟是过了百年又走回自居天朝上国、攘除夷狄的老路，庶几荒唐。



出了园林，马路旁的路牌上就写着“田间路”，两旁鳞次栉比安谧的人家，还有一座海德格尔人文中学，再行一段看到收割过的庄稼，一根根玉米秆挺立在雪地里，尽头是绵延的森林。我们想找到海德格尔幼时坐过的那张椅子，接二连三看到几条，总以为是却不能确定。好在走来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年夫妇去林中远足，上前一问才知道要走到树林里，说着就带我们同去。交谈中知道他们原来是弗莱堡人，在那里求学，也见过海氏。我们夸赞这里风景的辽阔，他们只说美是美却很无聊，大概知道我们从中国的大城市来，但看两位老人健步如飞，哪有什么萎靡无聊的样子。转眼间走到海德格尔的长椅旁，果真品相非凡，是大哲学家坐过的椅子，靠在一颗参天的橡树下，简洁肃穆。

海德格尔一生与自然亲近，难怪从 30 年代起就亲其全力分析和批判现代技术。但德国当代学者 Dieter Henrich 称其哲学先天与现代社会脱节。他对现代技术本质的分析着实深刻，但由于他彻底拒绝了对象化的主体性思考方式，除了等待最后之神的到来，没有提出任何积极面对现代社会危机的态度。他的学生约拿斯早在关于诺斯替主义的博士论文中就批评乃师的思想与将此在世界彻底贬低为恶神创造的堕落之所，寻求通过灵知与之脱离的诺斯替主义形态相似，而约拿斯晚年更是以无畏的理论勇气，在上帝无能、需要人的共同创造这一神学背景下，构建出坚韧有力的责任伦理学，与当时德国的环保运动同声呼应，在《责任原理》出版的次年 1980 年德国绿党建立，环保主义进入议会和内阁，直接影响政策制定。今日德国能一直保持如此宜人的自然环境，环保运动者的积极行动功不可没，约拿斯

的思想在德国也不断产生新活力，如今其全集的批判研究版也开始陆续编纂出版。再对比国内，许多知识分子一面痛批现代科技与资本主义对环境的毁坏，一面以所谓成熟的政治考量为理由拥护国家强权与每个毛孔都流着血的资本主义交媾，对民间的环保运动却又没有丝毫热情，如此做作，谈何天人合一，连自己的人格思想都彻底分裂。

在哲人之椅旁流连忘返一阵后，我们踏上回程。最后值得一提是，回到镇中心，想再看一眼海氏故居，问路时却被一位热情的先生拉进他的酒馆向我们讲解当地的民俗文化。当天其实是德国的传统狂欢日小丑节，梅斯基尔希的特色是以猫为象征，晚上人们会穿着猫的服饰、提着猫的灯笼游行，这位先生酒馆的墙上便挂满了历年狂欢的照片。眼看着最后一班车就要来，大家耐着性子听完他的讲解，临走还承他送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猫灯笼，也幸运地赶上班车。返途中在另一个城市 Sigmaringen 转火车，正巧碰上当地的游行队伍，人数不多，身着彩装，在空旷的夜色中欢笑喧哗，不禁想起童年时老家农村夜行的人声。

图 1 为梅斯基尔希一家墓碑店，图 2 为海德格尔之墓，图 3 为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图 4 为约拿斯《责任原理》书封

TRAVEL 行者

天堂与荒漠

观察员 言一（香港，richard7briner@gmail.com）

不知从何时起，香港忽地就被冠以“文化沙漠”之名；以致于在不少人眼里，香港只是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界。于是，当我闲来与身在大陆的友人分享在香港种种文化现场之经历时，他们大多会先以一种诧异的语气反问：香港不是一个“文化沙漠”么？接下来才是感叹，喜爱及至羡慕。

将香港视为“文化沙漠”的，同样也包括不少身在香港的人，以及在香港生活了数十年的香港本地人。正如我室友曾对

我道出的那样：香港人口约 700 万，长期对文化活动保有兴趣的恐怕也就是 5 万左右。其他人，在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一手遮天的城市里，成日里除了返工收工赚钱，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什么文化。就此情况而言，把香港称之为“文化沙漠”倒也并不为过。

室友所言，在我的不少个人经历中都得到了双重的验证：一方面，无论是 Kubrick 周日早场的艺术电影，还是周末文化中心与大会堂的音乐会或是剧场表演，观众群的三分之一总是来自不同阶层的鬼佬，另外的三分之一则是身处中产的中老年香港人，最后的三分之一则是由像我一样的游子，旅人以及其他各色身份人群组成。香港作为一个混杂(hybrid)都市的特质，由此亦可见一斑；而中年以下的青壮年人群在文化活动中的缺席也显得十分明显。



另一方面，哪怕仅是这 700 万中的 5 万人，(至少其绝对数量)亦不容小视。他们对于文化活动资讯的关注之紧密，日程安排之熟练，与下手之快捷，让我这个生性散漫，厌恶计划的人在扑飞(抢票)的战斗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随意屈指一算，便记起自己因为不愿定下日程或者在日程安排上的游移不定，而与香港诸多电影节中的《白丝带》，《敌基督》，《七夜侍》，雅克奥蒙专题回顾，德国新柏林派作品失之交臂。若不是这当中有部分电影会陆续登陆香港院线，那么我心底萦绕着的悔恨与怨念不知道还会浓上多少倍。

不过平心而论，尤其是在我摒弃了自身的诸多贪念之后，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却是：即便是成日什么都不用理会，单是每日去参与香港的各种文化现场亦是应付不过来的。举例来说，就在去年十月的短短一个月期间，便有香港国际爵士音乐节，香港建筑艺术节，丝绸之路艺术节，香港亚洲电影节以及文化中心二十周年庆典五大系列文化活动；紧随其后的十一月则带来了香港亚洲独立电影节，香港

社会运动电影节，香港德国电影节，十二月法国电影节强势登陆，同志电影节亦不逊风骚；再加上今年一月的欧洲电影节，仅仅单是看上去，香港就已然像是一个电影的天堂。而实际上，就我个人的观察，每个电影节的选片水准和组织构架亦属一流水准，除了推出不少名家和新锐导游的新作，更有不少特别的专题回顾，每一个电影节都有不少影片或是专题让人油然而生此生不容错过之感。若是再加上眼下正在上演的香港艺术节与即将到来的香港国际电影节，法国艺术节，以及香港平日里的常规文化活动，我想几乎没有人会反对，香港其实可以是一个文化的天堂，而不是文化的荒漠。但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观看文化演出本身并非不耗心力，更何况还需要在各演出场地来回奔走。其间的辛苦，即便是不用返工，金钱不愁的人士也未必吃得消。何况，香港在多年的商业文化浸淫下，还是一个朝九晚七的城市呐。

对于香港的“文化沙漠”这一称谓，港大的著名学者 Abbas 曾有一个著名的解释，他说：所谓的文化沙漠，其实是一种逆向幻觉(reverse hallucination)；换言之，文化的消失或是沙漠化并非是它不再存在---真正的消失，而是它变得不为人所见而已。试想，当整个社会都被经济与资本的符号充满，人们都被工作逼到无暇细心观看周围；自然那 5 万人的存在与活动便会变得难以察觉，而剩下 650 万人的生活方式似乎才是唯一可见的“正常”生活方式。以此推之，香港究竟是一个文化天堂还是荒漠，真正的关键或许还是在于作为感观主体的人之内心是否存有一个充满着被遗忘之美好事物的天堂。

图 1 为香港兰桂坊

OBITUARY 逝者

“你熟睡如橘”

——悼张枣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三月，终年无雪的上海下起桃花雪。夜间十点，我斜穿城市，从东北角的学校回到西南角的家中，路上积了一层薄如蝉翼的雪，转瞬即逝。想起雪夜访戴的传说，已经回到家里的我下楼访雪，半个小时，天空出现星星，雪零落成泥。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决断，否则，这个雪夜未曾存在。

再次回到家中，上网，看到张枣逝世的消息。我不敢确信，虽然明知这个名字绝少重复，还是再次搜索。网上已经出现悼念的文字，“另一封信打开后喊/死，是一件真事情”，1992年张枣在《哀歌》中这样写道。那一年他三十岁，十八年后因肺癌逝世于德国图宾根，享年四十八岁。

我与张枣缘悭一面。几年前他来上海，到了我所在的大学和我所在的学院，那里有他很多旧识。本来可以相见，但是我在家中，想到斜穿城市之累，加之耳闻我所在的学院有邀他落草之意，来日方长，我就偷懒，没有赶去。现在我只能自我安慰，擦肩而过或许可以减轻一些离别的哀伤。

张枣是一位低产诗人，似乎只公开出版过一本诗集《春秋来信》，但是他与同代最优秀的写作者保持推心置腹的对话关系。关于张枣的

诗歌，钟鸣的《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边》犹如悬丝诊脉。关于张枣本人，柏桦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里望闻问切，仿佛他的双胞胎兄弟。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张枣的代表作《镜中》几乎是每本当代诗选的必选作品。《断章》里的“我们到处叩问神迹/却找到偶然的東西”（《新京报》引用为“我四处叩问神迹，只找到了偶然的東西”），这几天更是在网上到处流传。“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的“后朦胧诗选萃”，把他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当做整本书的标题，这套书的封面和标题都非常般配，新潮得让当时的我不知所云，却有些着迷。《悠悠》中的“大伙儿戴好耳机，表情团结如玉”，《入夜》里的“花朵抬头注目空难”，都给我留下类似的印象。

张枣接续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很现代、很古典，很西方、很中国，很先锋、很传统。他笔下有《楚王梦雨》，有《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在组诗《历史与欲望》里，有《罗蜜欧与朱丽叶》，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面对异域题材，一部分写作者退避三舍，认为这样才能维护中文写作的纯正。但是，一种语言设定书写禁区，只能说明这种语言、这种书写尚未发育成熟。还有一部分写作者内外有别，以古典的方式书写中国，以现代的方式书写异域，这又把中西的空间差异转化为古今的时间差异。张枣不管面对何种题材，都以具有张枣特色的方式书写，不论华夷，正如汉唐，最具开放性，也最具主体性，“吾道一以贯之”——天变，道亦不变。谁能鉴定“表情团结如玉”是现代还是古典，是西方还是中国，是先锋还是传统？但无需多想，立即可以断定，这是汉语写作。

仅把张枣称作诗人是不够的，他在编辑、翻译上都具有特别的才华。



张枣长期担任《今天》海外版的诗歌编辑。在晦暗的 90 年代，我一直把《今天》和《二十一世纪》视为文学和思想领域的行业标准。它们都在境外，初次偶遇仿佛故人重逢，我暗暗称奇，原来理想中的杂志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它们展现的文学和思想风景，翻墙抵达我这里，魅力不减反增，总是掀起经久不息的风暴。出于各种原因，两份杂志日见式微，但是对于它们昔日的坚持和今日的勉力维持，我依然抱有敬意。

《春秋来信》收有张枣翻译的马克·斯特兰德、西默思·希尼、乔治·特拉克尔、勒内·夏尔、史蒂文斯，他还与陈东飏合译了史蒂文斯诗文集《最高虚构笔记》。我没有对照原文，不知张枣的翻译是否忠实原著。从中文来看，张枣依然是以具有张枣特色的方式翻译，诸如“齐眉”、“乱其目力”可作证明。但是，张枣没有回到文言的意思，如前所述，他接续的是 40 年代的传统，不是回到 1919 年之前。他对这些词语的使用很有节制，他让它们复活，不是一头钻进这些词语，进行复古大业。“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份。”——张枣曾作如是说。

张枣，这个你未能度过的三月，人们在温习你的诗歌：

——“你沉睡如橘”（《哀歌》）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秋天的戏剧》）

图 1 为诗人张枣

TRANSLATION 译介

生物伦理学的局限——专业尽于此，政治始于此

作者：Sally Satel

译者：朱芳艺（美国·孟菲斯，fangyizhu@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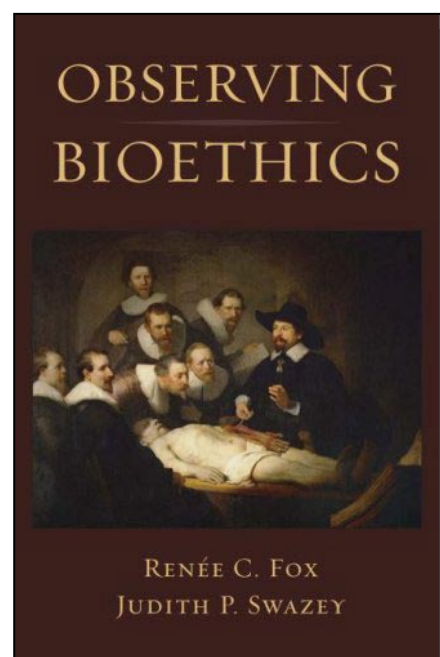
两年前的情人节那一天，保罗·瓦格纳，费城的一位四十岁的采购经理，将他的左肾捐献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盖尔·托马斯。瓦格纳是在网络上，通过 MatchingDonors.com 认识的托马斯，这位 65 岁的前歌剧演唱家。她的女儿发布了一条广告，请求极好心的陌生人拯救她的母亲。“我就是在那里得知，我所在的城市，费城，有一位女士急需帮助，”瓦格纳说。“这是我做出过的最好的决定。”这个故事有了一个美好结局。然而它却引出了关于是否违反道德规范的争议。

道格拉斯·汉托医生，波士顿的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院的一位器官移植外科医生，对这些窘困的病人自行寻找器官捐赠感到愤怒，他抱怨说“这会损害对整个系统的信任”。汉托所说的“系统”，指的是全国移植名单。现在，美国有 83000 人在排队等候肾脏。在诸如纽约或者加州等地，等待可能会长达八年。除非有亲友提供一个肾脏，像托马斯这样等待从一位刚逝世的捐赠者处得到器官的人们，只能在透析中憔悴苦等。每天，他们当中有 13 人因为器官没有及时到达而死去——因此托马斯的女儿才疯了似的恳求别人考虑捐赠器官给她母亲。

几年前，汉托，这位美国器官移植外科医师协会的伦理委员会前主席，让他所在的医院拒绝了一位名叫莉萨·康宁汉的虚弱的病人，一位带着幼子的 40 岁的前社工，她找到的捐赠者是从当地报纸上得知她的困境的。阿瑟·卡普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杰出的生物伦理学家，谴责网上寻求捐赠是一种“性急的爆发和让我先来的态度”，他这样告诉记者。

什么“让我先来”？康宁汉又没有从别人那里抢走一个肾。要不是由于她的故事刊登出来，根本就不会有人捐赠。而且，一个被称作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捐赠者将一个肾给予诸如康宁汉或托马斯这样的人，她们便不再排队了，而她们后面的人每个都往前挪了一下。当一个人被拯救的时候，并没有人受到损害。

卡普兰是一位生物伦理学家，他的头衔意味着他伦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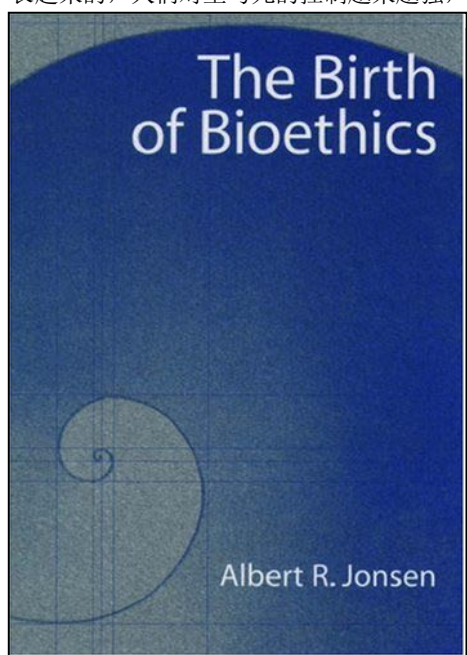
托曾任美国器官移植外科医师协会的伦理委员会主席。但是，我们该怎样理解他们的宣告他人生死问题的意愿？其实，我们对他们还是有一些了解的。首先，他们都相信绝对的平均主义：若非所有人都能获益，则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获益。其次，作为伦理学家，他们以为自己知道绝望的病人理应如何去做自己的私事。第三，对于要向重病患者传达这个绝望的消息，他们似乎没怎么感到不安：濒死的病人们啊，你们要消极被动——等着轮到你们吧，不要去主动去拯救自己。

做一个生物伦理学家，就可以有如此道德权威，去训导其他的人，什么是对而什么是错吗？这就是社会从它的“道德专家”那里所期许的东西么？

专家和公民该有什么样的正确关系，是一个长久以来令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们感兴趣的问题。至于生物伦理学家，他们对之享有权威的事情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还存有争议。按惯例，他们主要着眼于生物医学技术方面的争议，比如克隆、性别选择、体外受精、纳米技术、科研伦理、器官分配，诸如此类。现在，专家们需要插手政策的制定。社会学和生物伦理学的资深学者，瑞内·福克斯和朱蒂丝·斯瓦齐，极力提出要注意“在美国健康和享受医疗的权利方面的不平等”。这一领域实在是太“狭隘的美国中心”了，她们在2008年出版的《生物伦理学观察》中这样写道，它应该“更主要且更深地介入全球苦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在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部的外科医生兼哲学家霍华德·布洛蒂的新书《生物伦理学的未来》中，他教导生物伦理学家应该自我询问是否“向权力说出真相”，以此来衡量自己的成功。这些其实都是生物伦理学家所不应拥有的道德权利。

起源

生物伦理学家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一学科开始前很久就存在的医学中那些伦理难题，现在被称作生物伦理学。在道德神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阿尔伯特·R·琼森的权威著作《生物伦理学的诞生》中，将生物伦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起源时间定在1947年，那一年，23名外科医师在纽伦堡法庭被判决犯了战争罪行。其他人则相信，这一学科是从战后的技术进步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与死的控制越来越强，使得本来就讨厌的两难之境更加恶化了。围绕晚期病人看护、生殖技术、基因



操作、以及器官移植的争议，在1950和1960年代引起了天主教神学家和其他宗教学者的注意。在有哲学倾向的医生与科学家的协助下，他们开始将道德理论应用于现代医学争议。随着历史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法学家和其他人的加入，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久后便变得较世俗化了。

同时，当技术进步明显地提高医生的治疗能力，病人可以接受的医疗介入的范围增大了，而病人因不了解这些介入的风险性而变得更易受到伤害。这一认识带来了相关问题，诸如医生有责任告知病人其治疗方法、其他可替代的方法、术后预测、以及病人拒绝的权利。对医生家长制做法的激烈反对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引起学术界人士注意，他们从事民权和反战运动并对制度怀有强烈的不信任，着眼于重置医生与病患之间的力量平衡。

由于道德困境越来越大并提起人们注意，也许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专家——生物伦理学家——组成专业队伍以达到这一目标。由联邦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支持，以惊人的速度产生了一些这样的机构，其中有三个生物伦理学智囊团诞生于1969至1971年之间：纽约州北部的哈斯廷斯中心、位于费城的现已不再运作的健康与人类价值协会、以及乔治敦大学的肯尼迪伦理学院，后者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耶稣会学院。这些组织由医生、法学家、哲

学家、历史学家、人道主义者组成，他们的议程包括一些前沿问题诸如基因测试、器官移植、体外受精、新生儿重症监护、安乐死，以及其他围绕生与死的难题。在1970年代，威罗布鲁克¹和杜斯基²的研究丑闻曝光，科研伦理和管理监督从此也进入了生物伦理学范畴。

象牙塔中的人们渴望将他们的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当中。据哈斯廷斯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丹尼尔·卡拉汉说，他和他的

¹ 译注：Willowbrook State School是一所州立学校，专收智障儿童。70年代由电视台爆出丑闻，如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劣、体罚、性侵。

² 译注：Tuskegee丑闻被称为美国的纽伦堡。在盘尼西林已经可以治疗梅毒后，研究人员仍对非裔梅毒病人谎称正在治疗，以便了解梅毒的病情自然发展。70年代出被媒体曝光之后才停止。

同事们想要给哲学带来“一些社会刺激，一些‘关联’”。1982年，一篇题为《医学如何拯救了伦理学的生命》的文章中，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斯蒂芬·托尔敏主张，医学上的需要使道德哲学免于成为学术的一种副业。而毫无疑问，有些情况下，医生们自己也会向神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寻求帮助。

今天，生物伦理学家的足迹已遍布学术机构。各主要大学设有生物伦理中心，并提供多种课程：强化课程、执照课程、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这一领域有几个由同行审议的杂志以及一个主要专业协会。生物伦理学家执教医科学生和本科生；他们在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和学术审议董事会供职。在很多医院里，生物伦理学家随叫随到，在一些问题上给予指导，比如病人的神志清醒程度，以及是否应该开始某些延命治疗还是放弃。有些人经常被媒体采访，另外一些则给制药公司做咨询工作，还有少数甚至在法院作为专家证人。在公共政策领域，生物伦理学家受总统委任，制定联邦与各州方针，并给政治家提供建议。

自从1970年，萨基恩特·斯瑞瓦发明“生物伦理学”这个名词以来，生物伦理学的制度基础日益繁茂。仅仅迅猛的成长速度这一条，就使得该领域本身或许跟其研究的问题同样富有趣味。正如生物伦理学家卡尔·艾略特指出，社会的每个部分都有其道德尺度，“然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类生活领域的伦理学比医学中的伦理学更专业化……值得回头想想这一事实真是多么的不寻常。”毫不奇怪，生物伦理学凭借它自身的力量，已成为研究的对象。

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

今天，生物伦理学领域对它自身的认识也是多种多样的。在生物伦理学家的主要学术组织，美国生物伦理学和人道主义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 ASBH)的会议上，以及在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参加者们试图就生物伦理学是何种事业达成共识。它是一个学术问询的领域，一个学术的专业，咨询业，某种形式的政策制定或行动主义，一个监督科研人员和医生的监管机构，一种话语讨论，一个项目，还是一堆的问题和争议？一个生物伦理学家应该受什么样的训练？这一领域在一些主流政治问题上，比如伊拉克战争、达尔富尔和阿布扎比危机，是否应该有一个立场？生物伦理学家是否对其所供职的机构负有过多的感情债务？

当我在ASBH的2006年度会议上，就指定议题即该组织是否该采取政治立场发表讲话时，我说，不应该，而听众的反应实在是冷冰冰的。这个问题是社会本身已经争议了多年的。在讲话之后的提问时间里，几乎所有发问的生物伦理学家都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我的看法是，当一个专业组织就专业范围外的事务发表看法，他们的可信度会受损。他们说，恰恰相反，作为伦理问题上的专家，谁比我们更合适发表意见呢？我记得，我对ASBH的领导地位产生了同情，它不得不容纳这些互相抵触的观点，而我也佩服那些起初对我发出邀请的官员，他们无异于将协会内部的争议公诸于众。

将权力授予这么一群称作“生物伦理学家”的人，去解决最棘手的道德问题，对于社会来说是否在政治上令人满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什么给予伦理学家一个比其他人更合法的权利去拥有分辨对与错的智慧？所谓伦理问题上的专家意见——它像什么，谁能断言拥有它——是一个深刻的问题。生物伦理学在学术界、临床领域、和社会上的地位都对此提出反对。对我们当中大多数人而言，“正确”的理念可以回答复杂的道德困境，这种观念一看就是荒谬的。首先，它将如何衍生取决于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道德理论：道义论，后果论，自然法，由环境形成，诸如此类。

这也绝不否认严肃的道德思考的可能性，先不论其重要性，但是这样的分析可能是一个太迷惑的基本问题，以致于没有什么日常生活的效用。而且，不用说，很多生物伦理学家依靠的是他们自身在哲学上的偏见。所以，比如说，当生物伦理学家谴责乞求器官捐赠的行为，并认为这一行为不公平地让一些人获益并且侵犯了人类的尊严，这时我们必须提问：是什么给他们如此充足的理由去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找到一个“正确”的道德答案——假设真有这么一个正确答案存在的话——不是应用伦理学的本份。那么，生物伦理学能够提供些什么呢？它的专业技术又是什么？

当我们认为应用伦理学是一个审慎讨论的过程时，答案就出来了，它是关于如何决定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做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例如，当生物伦理学专家遇到一个问题，诸如生命终止时的决定，他带来的是文化史上关于这一争议的深刻知识，包括曾经用来解决问题的概念体系以及相关法律上的判决。这使得他能够对现下情形作一个模拟。在这一冲突之上盘桓已久后，生物伦理学家客观地描画出价值冲突，给出不同情形下的假设，根据逻辑的标准规则来评价各个论断的有效性，并且思考不同行动之后的潜在后果。他主要是要将这些分析传达给医生以及向他征询意见的管理人员。然而，当直接跟病人打交道时，责任就往往是帮助病人或者他们的所爱，在临终决定或医疗方案上达成一致。

最终，生物伦理学家将他的分析呈给决策位置上的人——一般是医生或管理人员——此人对他的病人和雇主负有责任。

生物伦理学家不应该对病人、医生或医院主张什么；他们应该主张的是不偏不倚的道德思考。他们也不应当错误地将道德真理的发现当作行动所需要的共识。那么，生物伦理学家的职责，应该是阐释说明争议，而不是解决争议。在医疗争论中，他们没有开处方的特权。

尽管很多生物伦理学家否认伦理学的职业化看上去暗示着道德权威，唉，很多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问问任何在医院工作的医生吧，相当肯定地，你会看到他们转转眼睛，叹息一声，然后听到你会听到无数的轶事，生物伦理学家是如何傲慢地将自己当成对与错的判官的（“道德术士”，批评家盖尔斯·斯科菲尔德是这么形容他们的）。在媒体报道的几乎所有生物医学上的争议中，都定然出现某生物伦理学家以神谕姿态说出来的语录。要传递的讯息很清楚：任何不同意我的人都是不体贴或不道德的。

这样的傲慢也让生物伦理学家自己感到挫败。纽约城边儿上的哈斯廷斯中心的埃里克·派伦斯，对公众如何看待伦理学家感到遗憾，他们认为伦理学家“一本正经或者傻乎乎到一定程度了，竟然声称自己有权对他人应该如何生活说三道四”。明尼苏达大学的卡尔·艾略特受够了这些“伦理人”，他评论说：“很多在生物伦理学领域或相关领域工作的人，在别人把他们称为‘生物伦理学家’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承认……一些人拒绝接受生物伦理学所暗示的专业人士及道德行家的光环。另一些人为我们的公共发言人的无礼和口若悬河感到赧颜。还有一些人则根本不愿意被看作是道德警察。”

生物伦理学和社会公义

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露丝·麦克林这样的生物伦理学家则想让生物伦理学采取社会公义这样激进的诉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生物伦理学家，”她在访谈中这样说道，“我承认我最关注的是，在社会中和不同社会之间，为更大的社会正义而奋斗，在世界上的各个群体中，减少健康、财富和其他资源的不平等。”霍华德·布罗蒂认为，未来生物伦理学的议题“应该关注权力的不平等”。这些也许是崇高的志向，但是我们必须问一问，生物伦理学家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特殊权威或者技能，使得他们有资格来解决全球健康问题，更别提全球经济问题了。在健康领域达到社会正义是一个复杂的任务，需要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普遍共识，关于医疗保健应该是怎么个样子，而应该拿什么样的方案来指导国内和国际的医疗资源分配。为使美国人免受生物伦理学上的帝国主义之责，他们将需要与那些在公正、公平和基本人权问题上也许与我们有着根本不同看法的国家达成共识，而别的国家互相之间亦有不同。

尚不清楚，在国际发展、全球健康及经济、政治理论方面的专家们的努力下，生物伦理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特的学问、实用智慧或尚未得到应用的道德思考而有些什么贡献，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贡献。的确，也许对道德选择平心静气的思考的确有一定作用，但是若要像福克斯和斯瓦齐所描绘的那样，寻求国际舞台的生物伦理学家听起来更像是意欲改变世界的活动家。而且，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悲剧场景并不需要什么精细的道德阐释。它们是由不公正的制度和腐败的领导人造成的，它们需要政治方面的、有时甚至是军事方面的国家和国际行动。变更令人压抑的制度，建立法律的规则，这些不是生物伦理学家的工作。那么，生物伦理学的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道德十字军的使命对该领域是否合适。或者，正如哲学家兼生物伦理学家约拿丹·莫雷诺正确地提出的那样：“一个学术领域是否可以不论在内部还是在外人眼中都保留其智力上的传统，而它的核心议题又似乎是神学问题而非专门技术，或者前者与后者至少比重相当？”

生物伦理学在目的、特征、以及专业术上的危机，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是一种衍生性的事业。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生物伦理学还不成为其为一个领域，而只是一个学者和博学的专业人士的学术交流圈子，他们在将道德理论应用到医疗难题上有着共同的兴趣。这些医师、法学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在学术科目上有所建树，这些科目的知识体系各有不同，并且都有着历史悠久的理论与调查方法。他们将那些知识传统拿来回答医疗上的价值冲突问题。但是，当这一兴趣交叉的领域将自身提升到一个主要的、半自治的领域的时候，基本就像妇女研究与黑人研究那样，它与其源头处的严格学术领域越来越疏远。现在很多学生没有任何其它领域的背景，却立志成为“生物伦理学家”。

“保守派”生物伦理学

尽管职业生物伦理学家也许不同意，当外行人以为他们可以作道德宣言的时候，他们倾向于一致对外。福克斯和斯瓦齐是这样描述主流生物伦理学的——她们认为“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生物伦理学的同义词”——在布什当政期间，它抱着蛮族的恶意，去与占有统治权的保守派生物伦理学家打交道。

生物伦理学的文化战争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 2001 年 8 月 9 日。当日，小布什总统宣布，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联邦资助要受到限制，并且任命李昂·卡斯，一位胚胎干细胞克隆的公开反对者，为生物伦理学总统委员会的新主管。

在 2009 年 6 月以前，在其任期之内，该委员会引发了很多学术界人士的大声谴责。在呼声最高的人当中有阿尔塔·查罗，威斯康星大学一位法学学者和生物伦理学家（他最近被奥巴马政府任命为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高级顾问），他将卡斯的掌权称为“蒙昧时代”。更戏剧化的是，当卡斯于 2004 年在 ASBH 作重要演说的时候，演讲厅的气氛充满了尖锐的敌意，一些听众在他演讲的时候背对着他站立。



暗示是明显的：保守主义的东西本质上是与科学进步不相容的，而延伸开来，与科学果实中受益的病人也不相容。回想一下克隆的苏格兰羊多莉，在 1997 年优雅地进入公众视野。在很大程度上，主流生物伦理学家为其所代表的医疗前景而感到振奋，而他们的右倾同行则视多莉的诞生为对生命神圣性的威胁，并且担忧该项目的开始最终很可能导致人为设计的孩子的克隆。左派和右派对于到底什么东西处于危险之中有着迥然相异的理解，完全可以说，这二者之间的鸿沟无法弥合。

一些保守派生物伦理学家是如此善于假想启示录式的、后人类时代的未来前景，而一位名叫威尔·萨勒坦的记者将他们描述为“站在历史的对面，叹息说‘哦伊’”。他说得没错。毫无疑问，他们的叹息是博学而雄辩的。保守主义生物伦理学家——或者任何生物伦理学家，就这个问题而言——为了谨慎起见，是不是应该为我们征询一下理性的意见呢？是的，但是他们太频繁地警告我们，根本就不要作任何进步。这真是讽刺。保守

主义生物伦理学对古老的含蓄智慧是如此毕恭毕敬，却很少从刚刚过去的时代中学习。为什么不也去研究一下体外受精、有偿卵子捐献、代孕的历史，学习一下文化对这些事情的抗拒和适应呢，为什么非要纠缠远古时代呢？

或者更进一步，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先前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可厌的，而现在却稀松无奇的事情呢？这样的从未有过的道德启示可以列出一张老长的单子：种痘、麻醉、输血、人身保险，人工授精。也许保守派生物伦理学家对于这些事情的系统分析并无兴趣，因为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不要把当做什么大事。或者，更可能，他们认为客观评价与他们并无关系，既然他们的信念是，某些事情冒犯了人类尊严，它们根本不应该去从事，无论它们可能带来多少益处。

那么政治呢？公平地说，主流生物伦理学家说保守生物伦理学家经常有政治议题，他们说得没错。可是他们自己也一样，他们断言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太党同伐异，太团结一致——如阿瑟·卡普兰说的“一个克隆出来的委员会”——却也真可笑。我自己也出席过几次委员会的会议，我可以证明其观点的多元化和议事的谨慎。到最后，没错儿，那些“哦伊”们是赢了，但是，并不令人惊讶地，其他生物伦理学委员也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倾向。他们“由自由派担任主席、员工，压倒多数的成员是自由派”，哈斯廷斯中心的丹尼尔·卡拉汉这样说道。“他们几乎完全不会受到批评。”当生物伦理学家们跟他们所供职的机关一起，在同样的意识形态海洋中游泳的时候，跟他们息息相通的同事们自然没什么可抱怨的——但偏见依然潜藏。

人类受试者

如果不讨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生物伦理学的讨论就不会完整。我们是通过伦理学监督的管理看到制度化的生物伦理学是怎样深深渗透了医疗系统的。在 1974 年，由于杜斯开基梅毒研究的曝光，议会相应地通过了“国家科研法”。它要求创立学院评审团（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s），来保证研究的益处必须超过其风险，并且在同意参加人体实验之前，参加者必须明白这些风险。在医学院、大学以及联邦机构进行的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都必须经过学院评审团的批准。

今天，很多学院评审团是墨守成规的官僚机构。受试者必须阅读和签字的知情同意文件可能长达几十页。为了免遭繁文缛节之害，研究者有时就干脆放弃了研究。向学院评审团申请在知情同意表格上改动一个字，可能在重新递交之后需要等待一个月那么长才能批准。出于对受试者隐私权的狂热关心，一些评审团要求原始数据在搜集之后几年内销毁，包括录音带和

对话记录。对于想重复实验或者想延续原始研究的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在繁重的文书工作和挑三拣四的异议当中，就算是最无害的干涉，也经常把项目推迟上几个月。这会花掉医学院一笔可观的金钱，而在抗癌药物的研究中，这还意味着活生生的生命的代价。

为确保知情同意和受试者权利而付出的努力，经常变质为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家长制度。来看看精神科研究人员在 911 袭击之后的抱怨吧。他们与受害者的及时接触被评审团阻止了，后者担忧这些项目中的填写问卷调查和进行访谈会“再次造成创伤”。按照这个思路，很多学院评审团花费了大量时间去讨论如果给予一个小小报偿，比如说 25 美元，受试者是否会“被迫”参与研究。一些更极端的例子包括不允许父母让他们得绝症的孩子参与研究。比如，在肝脏移植刚刚首创的时候，一些生物伦理学家说，不应该允许垂死婴儿的父母将自己的一小块救命的肝脏移植给孩子。原因呢？没有父母会拒绝拯救他们自己孩子生命的机会——这么说，他就肯定是“被迫”这样做的——所以这个选择根本就不该存在。

基于这样可疑的逻辑，父母的决定权就这样被剥夺了，因为旁观者清嘛。而且，正如医生长久以来看到的那样，一些父母的确拒绝这样做，特别是当他们有其他孩子的时候，他们为了另外的孩子必须保证自己健康，不能冒险动大手术。伦理学家还督促医生，不能将基因测试结果告诉乳腺癌高危的女人，他们相信，如果这些女人知道了，对她们会太危险，她们无法应付。这样的事情在 1990 年代中期反响很大。

但是，生物伦理学领域认为科研伦理的制度化是它最大的成就之一。福克斯和斯瓦齐参加了纪念贝尔蒙特报告（1979 年的阐述人类研究基本原则的一份文件）的周年会议，她们说当听到生物伦理学家们称赞贝尔蒙特为“近乎经典的”而“改变了世界”，并且因其影响而“被视为神圣”的时候，她们不禁笑了。诚然，没有人会否认对研究进行监督是必要的。但是在很多机构，钟摆已经过多地摆向谨慎一边。无情的监视和看上去任意的约束已经在审查者和研究人员之间造成了相互的不信任，使得立法更加困难，并且鼓励研究人员去投机。

生物伦理学家的优先权

当生物伦理学家说话的时候，谁在听呢？地质学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有分量，必须注意听他们的。无论如何，他们是气象科学的专家。而 1994 年，当生物伦理学家在《纽约时报》上打出一整页的广告，敦促全民健康保险的通过，这里他们给出的是什么专业知识呢？对这一争议感兴趣的公民对它的道德尺度早已非常熟悉了；不需要“专家”来告诉他们什么是道德的，什么不是。而就算是否认 MachingDonors.com，也不能命令脆弱的病人以及爱他们的人，或者大多数想救他们的医生。他们拥抱的是他们自己的道德诫命：通过陌生人的无以伦比的仁慈，将苦难减到最轻。

生物伦理学家最多不过是一些学者，他们研究医学和生物科技中价值争议的知识史和社会史。他们可以教给我们关于现有的争议在技术和文化上的先例，并且展示给我们如何进行训练有素的道德询问。他们擅长描绘当前困境的概念图谱，并列举不同的解决方法。用这样的方式，生物伦理学家确实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但是在此之外，他们的价值基本上是装门面的，或者是官僚的。当政治家召唤他们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将爆炸性的问题进行中和，或者给已经作出的决定加上道德的面纱。当医生召唤他们时，他们主要是在病人、员工、和家属之间，在作出临终决定的时候调停纠纷。媒体从生物伦理学家处寻求高尚的箴言。在医院和政府机构，他们组成监管大军。

难以衡量，有组织的生物伦理学到底对社会有过多少影响力。如果活动家派闭门不出，而学术派回家歇着，很难说不会有人想念他们。但人们还是希望这个学术和说教的团体存在下去。当我们的技术能力增长，使得我们更有能力操控生物学以及我们的命运，生物医学难题肯定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这将需要尽可能多的体贴的关注。但是社会公义问题应该留给其他人——留给我们大家。生物伦理学越想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变革，它就越背叛了它自己，而以旁门左道的方式变得政治化。

作者 Sally Satel，精神病医师，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她最近主编了《仅仅无私还不够：报偿肾脏捐献者的个案》(AEI Press, 2009)

原载：《政策评论》，2010 年 2-3 月，总第 159 号。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82722522.html>

TRANSLATION 译介

天鹅绒哲学革命

作者: André Glucksmann

译者: 吴万伟 (武汉, wuwanweione@yahoo.com.cn)

1989年11月9日夜晩,耻辱墙被打破。第二天早上,我动身前往柏林。不久以后我见证了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最后看到布达佩斯的齐奥塞斯库的倒台。1990年兴高采烈地为人类打开大门。但是我对东西方感受的情感差异印象深刻。西方的代



表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他的观点,即引起轰动的历史终结论。但是在东方,远不是这么回事。在柏林墙倒塌前不到一个月,我曾经在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联邦德国的精英面前发表演讲,向捷克异议者哈维尔致敬,他得到了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的和平奖,但在国内他还是个囚犯。我给演讲拟定的题目是“离开共产主义不是进入历史”,这是铁幕后面的人的观点。

西方产生困惑是因为它还没有准备好应对战后地缘政治的这样一种根本性动荡。在40年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理论家和记者一直在争论一个社会如何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除了主要是在波兰进行的少数关于把自由市场因素介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不能令人信服的研究外,从来没有对相反问题的研究,也就是

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正如哲学家约瑟夫·拉蒙达(Josep Ramoneda)已经观察到的,整个世界,无论共产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还是中间派都认为苏联及其卫星国不可能“回到”资本主义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当游行示威者在天鹅绒革命时期提出我们该如何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问题时,没有现成的答案。

就在西方知识分子观察1989年11月的柏林时,他们重新考虑了世界注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长久信念,但是仍然相信命运。上帝最终说话了,偶然性消除了,20世纪可怕的对立终结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75年冒险阶段(1914-1989)被忘记、擦掉、超越、跨过了。托克维尔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必然发生的普遍民主运动,圣西门主义者向生态学家传播管理事务将替代管理人的诺言,像福山这样的黑格尔主义者赞美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的战争,社会民主党人承诺人们之间的理解将会增强。我们在进入和平的、后现代的乐土。正如《后现代状况》的作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臭名昭著的话,那里伟大的英雄、伟大的人民、伟大的目标都消失了。冷战的结束使得从前所说的“自由世界”陷入无边无际的乐观情绪中。西欧马上削减了它的军事预算,而华盛顿宣称“世界新秩序”的到来。

刚刚从莫斯科的控制下解放的另一部分欧洲并没有分享这种乐观主义。从极权主义任人唯亲中摆脱出来的人们同时作为自由选择的代理人再次加入历史中来。

他们发现自己面临两个可能的将来。一个以哈维尔和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为代表,77宪章和波兰的团结工会为象征,另一个将来则以米洛舍维奇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为代表。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面临同样的后1989年挑战。在布拉格,普遍存在的贫困和腐败引诱因为天鹅绒革命上台的反极权主义异议者选择镇压而不是民主。虽然,他们最终的决定是决定性的,自由是最优先的选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解体,最后两者都加入欧盟。相反,在贝尔格莱德,狡猾和腐败的共产党官僚控制了权力,米洛舍维奇与各方镇压力量结盟对付自由的传染。虽然他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他依然保存了强制性方法。从1991年到1999年,南斯拉夫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和种族清洗活动。米洛舍维奇乐于靠流血重新获得失去的领土,最终遭到海牙国际法庭的审判,被控犯下反人类的罪行。

狂喜的西方人梦想极权主义的残酷阶段结束了,就好像苏联官僚经过70年的洗脑后仍然能够重新做人,或者能够很容易

地消除激进的民族主义独裁者的混乱。哈维尔认为，不能指望伟大的政治救主，捷克人需要自己承担责任，需要“无权者的权力”，需要曾经激励哈维尔的捷克哲学家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所说的“被压迫者的团结”，也就是受极权主义政权压迫而献身于反对他们的人。

最近，我们看到 2003 年格鲁吉亚和 2004 年乌克兰的民主抗议中的团结，这应该已经吸引了在 12 年里对车臣 20 万人的死亡充耳不闻人的注意。在乌克兰，普京总统无耻地干预他拒绝承认独立的国家的事务。在格鲁吉亚，他派去了坦克车。作为对国际媒体的回应，普京谴责遍及第比利斯和基辅的反对后苏联傀儡的和平抗议是“永久革命”和“危险的混乱”。因此，他破坏了长期以来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名声，在 1953 年东柏林血泊中开始的起义，在 1956 年的波兹南（Poznań）和布达佩斯持续，60 年代在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1968 年的布拉格，1980 年代团结工会的斗争，以及达到顶点的柏林墙倒塌。

是波兰的起义把天主教徒和自由思想家结合起来，他们处于冲突状态已经一个多世纪，是他们共同创建了团结工会。在俄国，现代派如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和传统信徒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肩并肩战斗。在布拉格和布拉提斯拉发（斯洛伐克首都---译注），大学教授不是讲授官方的谎言，而是选择成为擦窗户者或者修炉子者，77 宪章把左派和右派、怀疑论者和宗教人士都团结起来。反极权主义养育了自己的信念，异议者没有宗派意识，没有试图用另外的思想取代官方教条，相反事先引进了思想革命，这已经使重新绘制欧洲地图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成为可能。

这个革命还没有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并不欣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抗议活动。在不确定的历史领域，欧洲的新边界处于危急关头，它的两个选择依然是：哈维尔和米洛舍维奇。



图 1 为哈维尔；图 2 为天鹅绒革命时的群众集会

译自：The Velvet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André Glucksmann

作者简介：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法国哲学家。原文为法语，本文从阿列克斯·康乃尔（Alexis Cornet）的英译本翻译而成。http://www.city-journal.org/2010/20_1_velvet-revolution.html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网易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